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七十八本，第一分

出版日期：民國九十六年三月

印象與真相—— 清朝中英兩國的覲禮之爭

黃一農*

乾隆朝英使馬戛爾尼 (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 來華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覲禮之爭，一直是學界的世紀之謎。本文根據龐雜的清宮檔案以及散見於歐、美各地的西方原始材料，嘗試深入析探各文本與圖像的形塑過程及其作者的主觀意識，新發現當時或為提供雙方稍後各自表述的空間，遂協議先在入覲時行略加修改的中式禮節：雙膝下跪三次，每次三俯首深鞠躬，但不叩頭；緊接著在呈遞國書時，則用英式禮節，單膝跪地，親手將國書交給皇帝，但免去吻手禮。

又由於馬戛爾尼否認雙膝跪叩一事，亦與一八一六年來華的阿美士德 (William Pitt Amherst, 1773-1857) 使團及一八三三年的律勞卑 (William John Napier, 1786-1834) 事件有直接或間接的關涉，故文中也將討論這些與覲禮相關之衝突在鴉片戰爭以及晚清的對外交涉中所曾扮演的角色，並嘗試辨明歷史真相與印象間的分際。

關鍵詞：中英關係 覲禮之爭 馬戛爾尼 阿美士德 斯當東

* 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一・前言

在十八世紀下半葉，中國的對外貿易相當興盛，歐洲各主要海權國家大多在華設有商館，但幾乎全侷限於廣州一地，且只能與少數特定的中國行商進行交易。由於清廷對海外貿易及來華商人訂有嚴苛的規定，加上主其事的官府中人屢有敲詐或刁難的行爲，故積極進行海外擴張的英國，乃決定遣使來華爭取新的通商口岸與特殊待遇。¹

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贊助之下，² 馬戛爾尼 (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 奉英王熱沃爾日第三世 (George III, 1738-1820；今譯喬治三世)³ 之命出發使華，自此揭開近代此兩大帝國相互接觸、認識乃至於衝突的序幕。⁴ 馬戛爾尼以補祝乾隆帝的八秩大壽爲藉口來華，初頗獲皇帝榮寵，以爲他們是和朝鮮、安南、緬甸等四夷屬國一樣，因仰慕天朝國威而來，不知經貿利益才是其主要目的。

筆者在一套一七九三年於倫敦出版的四冊詩文集中，發現一首歌頌馬戛爾尼使華任務的小詩，曰：

Proud China, rich in silver ore,
On Clive's grand scheme . . . shall yield her store,
And ample funds supply . . .

¹ 有關英國東印度公司在當時中西貿易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行商所受地方官吏的剝削，可參見朱雍，《不願打開的中國大門：18世紀的外交與中國命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頁26-153；Kuo-Tung Anthony Ch'en（陳國棟），*The Insolvency of the Chinese Hong Merchants, 1760-1843* (Taipei: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1990)；〈1780-1800，中西貿易的關鍵時代〉，收入張炎憲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六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7），頁249-280。

² Hosea Ballou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2:216.

³ 本文中所涉及西名之漢譯，儘可能尊重當時的中國文獻，但由於清代之漢譯姓名常加口字旁，而這些字往往不屬常用漢字，故凡遇此情形，全名均省口字偏旁；如無中名者，亦不硬譯。

⁴ 本節中與馬戛爾尼使華事件相關之一般性討論，可參見秦國經、高煥婷，《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

驕傲的中國，富於銀礦，

在 Clive 的偉大計畫下……將掏空她的倉庫，

並豐富（英國的）資金……

詩中所提及的 Robert Clive (1725-1774)，是英屬印度殖民地的首位建立者。根據此詩頗長的原註：Clive 嘗起意要征服中國，以支付當時英國龐大的國債；一七八六至九三年間擔任印度總督的 Charles Cornwallis (1738-1805)，亦曾據以擬訂執行方案；當時有些英人期盼馬戛爾尼能說服乾隆皇帝，每年進貢 (pay us an annual tribute) 一千萬英鎊給英國，由英國負責維修長城，以遏阻韃靼人的侵略，並希望調動英國艦隊征服日本，且將其併入中華帝國。⁵

前詩的作者不詳，雖然他並不代表官方立場，且對中國的實情也欠缺瞭解，⁶但從此詩的刊傳，可知在十八世紀末，當自認是「天朝上國」的乾隆皇帝視馬戛爾尼為貢使時，也有英人期望中國向大不列顛帝國進貢。事實上，馬戛爾尼亦曾聽聞 Robert Clive 欲在中國大陸建立一塊殖民地的計畫。⁷亦即，英使來華的目的，加強商貿或只不過是其表面或近程的企圖而已！

馬戛爾尼雖期盼能在西方甫逐漸成形之國際法的精神下，以主權平等的方式進行外交觀見，卻又毫無保留地接受貢船才擁有的免稅待遇，並對易貨、購物等無關外交之事務，提出許多與使節身分不太合宜的要求。⁸尤其，英國本身並未以平等態度對待其他較弱勢的國家，每當時機成熟且力量足夠時，就常展開掠奪和殖民的行徑，其在美洲、非洲和印度等地即多如此。

至於長期處於明朝屈辱之下的後金，當其崛起之後，統治者亦開始用高人一等的傲慢來營造尊嚴，皇太極於天命十一年（1626）繼位稱汗時，即首度要求諸

⁵ 此段參見 *An Asylum for Fugitive Pieces, in Prose and Verse* (London: J. Debrett, 1793), 4:15.

⁶ 如他不知中國的銀礦並不豐富，還須仰賴進口；且不知大清帝國的統治者就是韃靼人，故不太仰賴長城為防禦工事。

⁷ J. 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62), p. 213.

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頁52-53，196-199；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係體制研究》（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頁168-174；秦國經、高煥婷，《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頁165。

貝勒和大臣須比照最高的告天之禮對其三跪九叩，此較明代的五拜三叩禮更隆重，⁹ 以凸顯皇帝在八旗制度下的獨尊地位；順治間，更規定凡元旦、冬至和萬壽節（指皇帝生日）等三大節，即使在外文武百官，俱應設香案、著朝服，望闕行三跪九叩禮。¹⁰ 當大清以雷霆萬鈞之勢征服中土並羈縻周遭國家之後，更在禮制中明確規定貢使進表時的儀注，要求他們比照中國臣子行三跪九叩之觀禮，¹¹ 以彰顯其共主地位。

由於清朝的對外關係一直以朝貢體制為主，先前荷蘭、葡萄牙等歐洲國家的來使，亦均被納入貢使之中，¹² 故馬戛爾尼所欲行的西方對等國家之觀禮，遂不可避免地成為中、英兩大帝國首次正式接觸時，相互角力較勁的焦點。而馬戛爾尼在覲見時雙膝與額頭所在的位置，竟然敏感地觸動了主導國族尊嚴的神經。亦即，當時雙方因覲見儀禮所產生的激烈衝突，應不只是「文化誤解」的層次而已。¹³ 再加上英使要求中國開放珠山（即今舟山）、寧波、天津等地通商，並在珠山和廣州附近各劃一小島供英人使用，乾隆帝因此認清其殖民擴張的野心，一一拒絕其各項要求。

然而，馬戛爾尼究竟在乾隆帝面前行何禮？由於當事人或諱莫高深，或各說各話，學界一直未獲定論：如秦國經和王開璽認為英使曾行三跪九叩禮；劉家駒稱在呈遞國書時應是雙膝下跪；普理查德（Earl H. Pritchard, 1907-1995）和王曾才主張未叩頭；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 1925-1999）初以為馬戛爾尼覲見時是

⁹ 三跪九叩禮是先雙膝下跪，接著俯首以兩手撐地，並將前額叩地後直起身子，再俯首叩地共三次後起立，接著重複此一系列動作共三遍。五拜三叩禮則是先拜手稽首四次，再一拜後跪地三叩首。參見李東陽等纂，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據明萬曆十五年刊本景印，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卷四四，頁13；卷四五，頁6-7。

¹⁰ 後金典制中的三跪九叩禮，首見於天命元年正月努爾哈赤即大汗位時，由他率貝勒和眾臣行此禮以告天。參見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據清康熙二十九年序刊本景印，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1993〕），卷四〇，頁1-2, 22。

¹¹ 特登額等纂，《欽定禮部則例》（據清道光間刊本景印，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卷一七一，頁1-15。

¹² 同前書，卷一七八，頁1-5；卷一八〇，頁1-10。

¹³ 何偉亞（James L. Hevia）稱此為兩帝國構建（imperial formations）之間的衝突；參見何偉亞著，鄧常春譯，《懷柔遠人：馬戛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26-27。

單膝下跪一次，但稍後則在無詳細論證的情形下，改稱根據清宮檔案應是行了三跪九叩禮；戴廷杰 (Pierre-Henri Durand) 認為是行九次單膝跪地禮，但不曾叩頭；朱雍等人則以疑存疑，不下定論。¹⁴

馬戛爾尼使團其實是一支大型的調查團，他們利用途經中國沿海和內陸的機會，對華進行大量的情資（含兵備、科技、動植物、地理、風土和社會）蒐集。使團返英之後，個別成員開始因名或利競相出版相關著作，有些還在文字之外搭配動人的黑白或彩色圖像，且大多很快被歐美各國翻譯，更常應市場需求而重印，深刻影響到此後至少半個世紀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印象。部分圖文所呈現出的社會落後與政治腐敗，或也鼓動了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的侵華動機。自滿自足的大清帝國，雖在乾隆朝暫時拒絕了門戶開放的要求，卻終究無法抵抗半個世紀之後以武力做為後盾的列強侵略，淪入次殖民地之列。¹⁵

或因漢學界日益瞭解此一外交任務在中西交流史以及近代世界史上的重要意義，近十多年來，用英文書寫的相關學術專書和博士論文頗多；¹⁶ 在倫敦和北京

¹⁴ 近代有關觀禮之爭的研究，主要參見 Earl H. Pritchard, "The Koto in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in 1793,"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2.2 (1943): 163-203；王曾才，〈馬戛爾尼使團評述〉，收入《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8），頁235-248；劉家駒，〈英使馬戛爾尼謁見乾隆皇帝的禮儀問題〉，收入《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頁27-49；朱雍，〈不願打開的中國大門〉，頁218-232；Alain Peyrefitte, *The Immobile Empire: The First Great Collision of the East and West*, trans. Jon Rothschil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92), pp. 223-231；佩雷菲特 (Alain Peyrefitte) 著，王國卿等譯，〈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北京：三聯書店，1993），頁258-267；佩雷菲特，〈序言〉，收入《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10-22；秦國經，〈從清宮檔案看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歷史事實〉，收入《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23-88；戴廷杰著，許明龍譯，〈兼聽則明：馬戛爾尼使華再探〉，收入《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89-150；王開壘，〈隔膜、衝突與趨同：清代外交禮儀之爭透析〉（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頁120-152。

¹⁵ 此段參見黃一農，〈龍與獅對望的世界：以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後的出版物為例〉，《故宮學術季刊》21.2(2003)：265-297。

¹⁶ 如見 Zhang Shunhong (張順洪)，"British Views on China during the Time of the Embassies of Lord Macartney and Lord Amherst (1790-1820)" (PhD dis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0); Aubrey Singer, *The Lion and the Dragon: The Story of the First British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the Emperor Qianlong in Peking 1792-1794* (London: Barrie & Jenkins Ltd., 1992); 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Zeng Jingmin (曾敬民)，"Scientific

也曾分別召開過學術研討會，以紀念該事件發生兩百週年。¹⁷ 反倒是理應最重視此事的中國學界，專書部分迄今只見秦國經和高煥婷合撰的《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餘均屬譯介西人之作。

法國作家佩雷菲特對推動馬戛爾尼使華事件的研究，尤其扮演重要角色，他曾任該國教育部部長等要職，從政壇退休後始對中國研究產生濃厚興趣。¹⁸ 他參照十五種使團人員的記載，於一九八九年出版暢銷書《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L'Empire immobile ou le choc des mondes*)，探討乾隆朝英使來華事件，隨後並組織學者將該書所曾運用的大量中外文獻譯成法文出版，且刊行由使團畫師額勒桑德 (William Alexander, 1767-1816) 等人所繪的精采圖像。¹⁹ 雖然佩雷菲特本身或無法直接研讀中國原始檔案，但他所掌握的西方史料迄今仍少有人能出其右。在其積極推動之下，北京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更於一九九六年將存世的七百多件漢文相關文獻，完整景印成《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一巨冊。

至於美國學者何偉亞的《懷柔遠人》(*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1995)，則是晚近相關著述當中最受矚目者。該書乃從後現代主義的角度，重新探討馬戛爾尼使華事件的歷史意涵，論點十分新穎，因而獲得美國亞洲學會一九九七年的最佳著作獎；但有部分學者批評其對史料的掌握有瑕疵，甚至因此在漢學界引發「現代史學」與「後現代史學」的路線之爭，褒貶呈現兩極。²⁰ 但不可否認地，該書

Aspects of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1792-1794: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ish and Chinese Conceptio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1998).

¹⁷ Robert A. Bickers (畢可思), *Ritual & Diplomacy: The Macartney Mission to China 1792-1794* (London: The Wellsweep Press, 1993); 張芝聯、成崇德主編,《中英通使二百週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¹⁸ <http://www.goodbyemag.com/nov99/peyrefitte.html>.

¹⁹ Alain Peyrefitte, *L'Empire immobile ou le choc des mondes*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89); *Images de l'Empire immobile*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90); *Un choc de cultures: La vision des Chinois*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91); *Un choc de cultures: Le regard des Anglais*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98); *Un choc de cultures: L'oeil des Missionnaires*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00). 其中最後兩書均厚逾六百頁，不僅逐日翻譯了幾本由使團中人所撰寫的罕見手稿，亦整理出傳教士們的相關敘述，可惜均未附原文以供對照參考。

²⁰ 如見 James L. Hevia, “Postpolemical Historiography: A Response to Joseph W. Esherick,” *Modern China* 24.3 (1998): 319-327; Joseph W. Esherick (周錫瑞), “Traduttore, Traditore: A

確實帶動學界對此一歷史事件的高度興趣，並讓我們瞭解在史實重建和問題意識等方面，均還有許多可以努力或突破的空間。

由於先前西方有些治此課題的學者，或無法直接深入析究相關漢文檔案的內容；大部分（尤其是兩岸）的史學工作者，亦多不曾過眼散見於歐美各地的西方原始材料；更有甚者，先前主要的學術論著多完成於《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刊行之前，其中龐雜的清宮檔案尚不曾被充分利用，故我們或有必要先回歸基礎研究。

下文即選擇馬戛爾尼使華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觀禮之爭，²¹ 嘗試深入析探各文本與圖像的形塑過程及其作者的主觀意識，並進行交叉比較，以辨明真相與印象間的分際，期盼能因此提供一較客觀的歷史認識；同時，也將藉由此一案例再探「e-考據時代」對史學研究可能產生的衝擊。²²

現今中國社會熟悉的三跪九叩禮，始自先清時期，其中雙膝是否下跪、前額有無叩地以及跪叩的次數，均為合儀與否的關鍵。然而，先前學界除了劉家駒和戴廷杰等少數人外，在析究清朝英使所遭遇的觀禮之爭時，往往將此禮的內容過分單純化，且均未能區隔不同場合所應行的不同儀禮，並較細微地去考量雙方在談判中努力尋求妥協的氛圍。至於與使團觀禮相關的圖像，亦常被逕自當成實景的呈現，其創作過程和可靠性幾乎從不曾被深入解讀過。

拜古舊書店網路平臺之整合以及古典文獻大規模數位化之賜，²³ 我們現已有較好的條件迅速掌握一、兩百年前的出版物，並過覽散見於世界各收藏機構的原

Reply to James Hevia,” *Modern China* 24.3 (1998): 328-332；艾爾曼 (Benjamin Elman)、胡志德 (Theodore Hutters)，〈馬戛爾尼使團、後現代主義與近代中國史：評周錫瑞對何偉亞著作的批評〉，《二十一世紀》44(1997)：118-130；葛劍雄，〈就事論事與不就事論事：我看《懷柔遠人》之爭〉，《二十一世紀》46(1998)：135-139；張隆溪，〈「餘論」的餘論〉，《二十一世紀》65(2001)：90-91；羅志田，〈譯序〉，收入何偉亞，《懷柔遠人》，頁1-31。

²¹ 參見何偉亞，《懷柔遠人》，頁158-185。

²² 先前之討論，參見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頁33-64。

²³ 如 abebooks.com 整合西方世界逾一萬三千五百家古舊書店的一億冊庫藏，許多絕版書和古書常仍可購得。又，在大型資料庫 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 (<http://www.gale.com/EighteenthCentury/>) 中，已有十五萬冊十八世紀的印刷品被掃描上網，且全部三千三百萬頁文字均可全文檢索，其中與馬戛爾尼使團相關之專書，若算入不同之版本，即有約二十種。

始材料。筆者在下文即嘗試爬梳並整合相關之中外文獻，期望能在前人的基礎上，將此課題的研究水準帶至一較高的位階。又由於此事對一八一六年來華的阿美士德使團以及一八三三年的律勞卑事件，均有直接或間接的關涉，故文中也將討論這些覲禮之爭在鴉片戰爭及晚清的對外交涉中所曾扮演的角色。

二・乾隆朝馬戛爾尼使團的覲禮之爭

乾隆五十八年（1793）六月，英使船隊順利抵達天津外洋。二十七日，乾隆帝下諭給直隸總督梁肯堂等人，命其可在天津先行宴請馬戛爾尼，他並首度對雙方交接的儀禮有所訓示，曰：

接待遠人之道，貴於豐儉適中，不卑不亢。若該貢使等於進謁時行叩見之禮，該督等固不必辭卻，倘伊等不行此禮，亦祇可順其國俗，不必加之勉強。該督等務宜留心款待，不可過於優待，轉為所輕，以示懷柔而符體制。²⁴

其意或指不必在英使初來之時就勉強其遵循中國儀節，但並不代表皇帝不計較正式覲禮的形式。事實上，其真正意圖還是要英使符合「體制」。故我們只可藉以推論乾隆皇帝對英使初來之時與中國官員的交接方式，並不十分在意。

由於馬戛爾尼要求與擔任欽差的長蘆鹽政徵瑞「平行相見」，而徵瑞認為如先行往見，將「有失體制」，遂派天津道喬人傑和通州副將王文雄登船取看表文和禮單。此舉遭到皇帝的斥責，認為徵瑞「未免太過」、「自居尊大，與遠人斤斤計量」，並稱：「試思該使臣向徵瑞行叩見禮，亦無足為榮；即不行叩見禮，亦何所損……況該使臣航海遠來，至一年之久，始抵天津，亦當格外加之體恤，豈可以此等相見禮節與之較論，殊非懷柔遠人之道」。²⁵

乾隆帝雖一面責備徵瑞矯枉過正，且指示對相見禮節不需太過計較，但在二十九日卻又下諭：

外夷遣使入貢，其陪臣與天朝臣工相見，禮節自有定制。即如阮光平係安南國王，其與同知王撫棠接見時，禮貌尚極恭敬，何況瑪嘎爾呢等不過該國使臣，而徵瑞係欽差前往照料，該使臣進謁時自應倍加恭敬。接待外夷

²⁴ 《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37-38。

²⁵ 此段參見前書，頁38, 351。

之道，全在斟酌適中，不卑不亢……若過於優禮，夷性貪得便宜，待之愈厚，則其心益驕，轉使外夷不知天朝體統尊嚴，為所輕忽，關係甚重。²⁶ 字裡行間顯露他對英使的恭敬與否，應是十分在意；但此一態度轉折，應亦讓徵瑞等人深感「天心難測」。筆者認為乾隆皇帝原或希望馬戛爾尼等人能自發地行中國式禮節，不需施壓勉強，但在發現英使的姿態甚高之後，又擔心徵瑞等人不能體會其內心真正的想法，對來使過分優禮，才再度明白點出相關儀節應依循定制。

三十日，乾隆皇帝諭旨不許稱英使為「欽差」，應正名為「貢使」。²⁷ 當時在使團所搭乘的船隻上，均分插書有「英吉利國貢舡」字樣的旗幟，甚至在其所攜來的每箱禮物，亦上插「英吉利國貢物」等旗幟，英使雖不滿「貢」(tribute)字所涵蘊的貶意，但為避免不必要的紛爭，只好視若無睹。²⁸ 此或因馬戛爾尼在出使時所受的訓令是：「抵華後儘快安排覲見，只要不損害英王的榮譽與你自己的尊嚴，均可遵從清廷的各種儀禮。」²⁹

七月初一日，梁肯堂和徵瑞奏稱，他們於六月二十九日在大沽向英使敬宣恩旨時，該使臣曾對代表皇帝的香案「免冠竦立」。³⁰ 稍後，梁肯堂等又奏稱七月初五日他代表皇帝在天津設宴款待英使時，正、副使均「免冠叩首」以感謝皇恩。³¹ 然而，使團中人則記稱梁肯堂在大沽時是單獨接見英使，其態度非常恭敬謙虛，對行禮之事並未特別要求；但在天津時，因欽差徵瑞的堅持，馬戛爾尼等人勉強行了「深鞠躬」(profound inclination of the body) 禮。³²

由於乾隆帝發覺奏疏中所記英使兩次謝恩時所行用的儀禮不同，遂在七月初八日的上諭中命梁肯堂等人查明具奏，該諭旨有云：

²⁶ 《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118。

²⁷ 同前書，頁40。

²⁸ 大英圖書館藏有由額勒桑德所繪此兩旗幟之圖，另參見 George Leonard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Philadelphia: Robert Campbell, 1799), 2:25-26. 又，此一由斯當東所撰之報告，版本甚多，初版乃於一七九七年在倫敦發行；中文本參見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香港：三聯書店，1994）。

²⁹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2:217.

³⁰ 《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360。

³¹ 同前書，頁364。

³² G. L.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1:261-270.

向聞西洋人用布紮腿，跪拜不便，是其國俗不知叩首之禮，或祇係免冠、鞠躬、點首。而該督等摺內聲敘未能明晰，遂指為叩首，亦未可定。著傳諭徵瑞，如該使臣於筵宴時實在叩首則已，如仍止免冠、點首，則當於無意閒談時婉詞告知，以各處藩封到天朝進貢觀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禮，即國王親自來朝者，亦同此禮。今爾國王遣爾等前來祝嘏，自應遵天朝法度，雖爾國俗俱用布紮縛，不能拜跪，但爾叩見時何妨暫時鬆解，俟行禮後再行紮縛，亦屬甚便。若爾等拘泥國俗，不行此禮，轉失爾國王遣爾航海遠來祝釐納貢之誠，且貽各藩部、使臣譏笑，恐在朝引禮大臣亦不容也。³³

乾隆皇帝懷疑英使當時只是脫帽俯首鞠躬，而非梁肯堂所稱的叩首。由於皇帝聽聞西洋人有用布紮腿的習慣，或因此不便跪拜，故命梁肯堂等人以不經意的方式勸告英使行三跪九叩之禮，並稱如因用布紮縛導致不能拜跪，亦可暫時鬆解，待行禮完後再重新紮上。

乾隆皇帝在前引文中提到外國來華進貢觀光者，即使是國王本人，亦均行三跪九叩之禮，所指應為乾隆五十五年入覲以慶賀皇帝八十大壽的安南國王阮光平，他當時在各種場合均依照中國之禮跪叩如儀。³⁴

七月十二日，徵瑞奏稱英使正學習跪拜之事，曰：

再西洋人用布紮腿，跪拜不便，誠如聖諭，其俗不會叩首之禮。奴才先與督臣在海下兩次敬宣恩旨，該使臣止免冠俯首，奴才察其隨從之人紮腿，用布十分箍緊，如貢使等則用綢紮，尚覺寬鬆，可以屈膝。遂告知天朝有跪拜儀注，將來瞻仰大皇帝，需行三跪九叩首之禮，囑其學習。該使臣欣然願學，是以在天津筵宴時，亦知屈一足作跪。今奉諭旨，令奴才婉辭告

³³ 《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128-129。

³⁴ 自康熙初年起，在冊封或頒詔時，安南即屢屢要求能依其「國俗」對香案或詔書行五拜三叩之禮，雙方因此多次發生儀禮之爭；但由於清使的個人態度不同，歷次的處理方式因此鬆緊不一，在兩國的記載中亦曾各說各話。此事直到乾隆二十七年才徹底解決，當時正使德保和副使顧汝修奉派至安南冊封國王，雙方又發生覲禮之爭，最後雖遵從清朝禮制，但忿忿不平的顧汝修，卻在回國之後還自行去函責備安南國王，顧氏雖因「不識大體」而遭革職處分，但乾隆帝也因而正式傳諭安南，命其以後必須嚴格遵循三跪九叩之禮。參見阿桂，《八旬萬壽盛典》（據《文淵閣四庫全書》鈔本景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五三，頁6-7；卷七八，頁110；牛軍凱，〈三跪九叩與五拜三叩：清朝與安南的禮儀之爭〉，《南洋問題研究》2005.2：46-52。

知，各處藩封俱行三跪九叩首禮，奴才遵即於無意中告以不學此禮，必為各藩部所笑談你們夯（農按：音義均同「笨」）。該使臣亦深以不嫻為愧，連日奴才察看，該使臣等學習漸能跪叩，惟善於遺忘，奴才自當隨時教導，俾知敬謹，遵奉天朝禮節，以臻妥善。³⁵

指英使在大沽接受恩旨時，是脫帽鞠躬，而在天津筵宴時，則是單膝下跪；他並順著乾隆帝的說法，稱西洋人因有紮腿之俗，故不易跪拜。徵瑞為營造自己的辦事效率，遂稱英使「深以不嫻（三跪九叩之禮）為愧」，並「欣然願學」，但此或只是搪塞之言，馬戛爾尼此時應尚未讓步，徵瑞為避免將來可能穿幫，故又稱英使「善於遺忘」，提供已說一些轉圜空間。

七月十二日，洋洋得意的乾隆傳諭曰：

該使臣等奉伊國王差遣，遠來祝釐納貢，其敬奉天朝，自係出於至誠，斷不敢稍愆禮節，致蹈不恭之咎。今該使臣等經徵瑞告知，途次敬謹學習跪拜，其瞻覲時自必能恪遵儀節。

並要徵瑞對英使沿途格外照料，行程不必過於匆忙，只要在八月初來到皇帝正避暑的熱河即可。但軍機處則通知徵瑞應提早到達，此因英使還須花時間習禮，「倘有不合儀節之處，尚應逐一指示，拜跪嫻熟，方可帶領瞻覲」。³⁶

英國使團於七月二十七日離京北上覲見，八月初四日上午抵達熱河。由於馬戛爾尼對觀禮之事始終耿耿於懷，故先前在北京時，他即曾請徵瑞將一份漢字說帖轉交擔任軍機大臣的閣老和坤，其中強調英國是獨立國，應與藩屬國的謁見禮不同，要求受到清廷的平等對待；如必欲英使行三跪九叩禮，中國亦須派出一地位相當之人對英王肖像行相同之禮。³⁷ 但徵瑞卻在抵熱河時將已拆封的說帖交還，並稱該帖從不曾上呈。當天馬戛爾尼原本期望和坤會到訪，故令全團多次預演迎接的過程，並一直保持待命狀態，但對方卻以膝傷為由，始終不曾露面。³⁸

³⁵ 《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374。

³⁶ 此段參見前書，頁133。

³⁷ Earl H. Pritchard, "Letters from Missionaries at Peking Relating to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ung Pao* 31 (1934): 1-57, especially p. 15.

³⁸ 參見 Cranmer-Byng, *An Embassy to China* (1962), p. 118; G. L.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2:65; Aeneas Anderson, *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Years 1792, 1793, and 1794* (London: J. Debrett, 1795), pp. 139-140. 戴廷杰在其〈兼聽則明〉一文中，誤稱該說帖的封口完好，見頁115。

傍晚時，馬戛爾尼只好派斯當東（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1801）父子至和珅住處商談觀禮相關事宜。³⁹

八月初四日，軍機處奏進「初六、初九兩日英吉利國瞻觀儀注二單」，《上諭檔》中尚存原預定於初六日在澹泊敬誠殿接受英使呈遞國書之儀注，其文曰：

俟卯初二刻，外邊伺候齊備，恭請皇上御龍袍褂，升澹泊敬誠殿寶座。所有王公、蒙古王公、九卿等，各於殿內兩邊依次序立。臣等帶領英吉利國正、副使，臣在階下向上跪捧表章，臣福長安隨接表章，由中路行走至殿內地平下跪獻，臣豐紳殷德接捧由中踏蹕直至御前跪遞，皇上受表仍交於豐紳殷德，即由地平西踏蹕捧下，轉交內侍祇領。臣等即將該正、副使由西踏蹕帶至御前跪，候皇上親賞該國王如意，宣旨存問，畢；臣等仍由西踏蹕帶至地平前中間檻內，向上行三跪九叩首禮，畢；即令其入於西邊二排之末，各行一叩首禮，歸坐賜茶；接茶盞後，又各行一叩首禮；飲畢，各於本位站立；俟駕還宮，臣等帶領至清音閣外邊直房伺候；俟皇上至看戲樓升座，臣等帶領該正、副使至階下祇候宣召；再帶領至御前，俟皇上賞該國王朝珠，畢；臣等將其帶至院內觀看賞賜文綺各物，令其向上行謝恩禮，畢；帶至西邊廊下觀劇，臣等再將頒賞各物領出，按單給領。⁴⁰

其中澹泊敬誠殿是熱河避暑山莊的主殿，其作用相當於北京的太和殿，清帝常在這裏舉行大典或接見重要人物。據此儀注，英王的國書擬先由御前大臣福長安接過，再交和珅之子額駙豐紳殷德跪呈御覽。

軍機處之《隨手檔》中註稱前引之儀注單曾遭「硃改」，⁴¹該修訂後的程序為：

卯初，請皇上御龍袍褂，陞寶座……臣和珅同禮部堂官，率欽天監監副索德超，帶領英吉利國正、副使，臣等恭逢〔捧〕表文，由避暑山莊宮門右邊門進呈殿前階下，向上跪捧恭遞，御前大臣福長安恭摺轉呈御覽。臣等即令該貢使等向上行三跪九叩頭禮，畢……帶領該貢使於西邊二排之末，令其隨同叩頭入座。⁴²

³⁹ George Thomas Staunton, *Journal of a Voyage to China*, 2nd part (Special Collections Library, Duke University, 1793-1794), fol. 103.

⁴⁰ 《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146-147。

⁴¹ 同前書，頁261。

⁴² 同前書，頁600-601。

其中國書簡化成由福長安一人轉呈御覽。從前引觀見儀注之細緻，亦知清廷對儀禮之重視。但朝廷或因甫自徵瑞得知英使不願行三跪九叩首禮的訊息，⁴³ 以致事情突然生變。

對英使極為不滿的乾隆皇帝，於初五日諭令山東、江南、江西和廣東的總督和巡撫，稱將來使團在返國途經各地時，「一切尖宿供頓，俱可省其預備」。⁴⁴ 同日，由和珅發出的廷寄中亦曰：

此次該使臣等前來熱河，於禮節多未諳悉，朕心深為不愜。伊等前此進京時經過沿途，地方官款接供給，未免過於優待，以致該貢使等妄自驕矜，將來伊等回國……尖宿供頓，俱可照例預備，不可過於豐厚。其經過水程地方，該督、撫等祇應飭令州縣照常供應，雖所需口分等項，自不應致有短缺，但祇須照例應付，不得踵事增華，徒滋煩費。此等無知外夷，亦不值加以優禮！⁴⁵

其中原本較帶情緒性之「尖宿供頓，俱可省其預備」等文字，被硃筆改成較和緩之「尖宿供頓，俱可照例預備，不可過於豐厚」。

初六日，乾隆帝又諭令山東等省之督、撫，當英使回國經過時，僅需派員護送，不必親自接見，且稱：「水陸路尖宿供給，照例再為減半，斷不可稍從豐厚！」⁴⁶ 皇帝這幾天的的心情起伏躍然紙上。同日，乾隆帝亦下旨給留京之王、大臣曰：

此次英吉利國使臣到京，原欲照乾隆十八年之例，令其瞻仰景勝、觀看伎劇，並因其航海來朝，道路較遠，欲比上次更加恩視。今該使臣等到熱河後，遷延裝病，觀望許多，不知禮節。昨令軍機大臣傳見來使，該正使捏病不到，止令副使前來，並呈出字一紙，語涉無知，當經和珅等面加駁

⁴³ 根據斯當東的說法，該帖原已送抵熱河，其中之建議並獲同意，卻由於兩廣總督福康安的反對而生變。查先前英國曾協助廓爾喀犯邊，奉命赴西藏處理此事的福康安，或因此對該國保持戒心。惟若清廷早已見到馬戛爾尼有關觀見儀禮的說帖，當知此事相當棘手，應不至於在雙方還未談妥之前，即訂下呈遞國書的時間和儀注。況且，徵瑞於初六日拜望馬戛爾尼時，小斯當東在其日記稿本中稱他被連降兩級，此或即因其未能及時將此事上稟所致。參見 G. L.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2:65; G. T. Staunton, *Journal of a Voyage to China*, 2nd part, fol. 104.

⁴⁴ 《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261。

⁴⁵ 同前書，頁533。

⁴⁶ 同前書，頁261, 535。

斥，詞嚴義正，深得大臣之體。現今演習儀節，尚在託病遷延，似此妄自驕矜，朕意深為不愜，已令減其供給，所有格外賞賜，此間不復頒給，京中伎劇，亦不必預備。俟照例筵宴，過萬壽節後，即令該使臣等回京……使臣進見時，亦不必起立，止須預備机櫬，令其旁坐……俟其在寓收拾一二日，妥為照料，賚發起身……不必令在京伺候迴鑾接駕。朕於外夷入覲，如果誠心恭順，必加以恩待，用示懷柔。若稍涉驕矜，則是伊無福承受恩典，亦即減其接待之禮，以示體制，此駕馭外藩之道宜然……。⁴⁷

原文中有兩處遭硃筆改動，一處是將「優待」改為「恩視」，另一處則是將「遷延觀望」改成「遷延裝病，觀望許多」。其中「恩視」一詞的使用，明顯較原先的「優待」兩字給人多些居高臨下的感覺。至於所謂的「乾隆十八年之例」，乃指博爾都噶里雅（即今譯之葡萄牙）的來使，當時皇帝除在乾清宮召見外，並於圓明園之山高水長幄次以及附近的長春園賜宴。⁴⁸

乾隆帝在前引文中，指稱他先前（初四日）曾命軍機大臣和坤傳見馬戛爾尼，談論覲見之儀禮等事，但身為英國使節的馬戛爾尼，當時恐因為維持國家尊嚴，不願親赴和坤的居處，改派斯當東以全權公使的身分，攜帶英王表文的副本和該說帖往見，遂遭乾隆皇帝嚴辭抨擊他「裝病」。惟根據馬戛爾尼之日記，當時和坤亦聲稱自己因膝傷無法往見剛抵熱河的英使，不知和坤是否亦為裝病？和坤在接見斯當東時，做出對該說帖毫不知情的樣子，並義正詞嚴地當面駁斥，且要斯當東將他的理由轉告馬戛爾尼，請其重加考慮。⁴⁹

由於英使不願「演習儀節」，乾隆帝在前引文中遂擬將相關之招待降格，並打算在萬壽節過後，即令英使回京，且在皇帝自熱河回鑾之前就打發使團返國，他甚至諭告在京大臣，接待英使時不必起立，只需在旁為其預備矮凳子即可，並於一、二日後就打發他們回國，不必等到回鑾時在京接駕，不滿情緒形諸筆墨！

初六日早晨，徵瑞又造訪馬戛爾尼，要他遵依中國的規矩，並語出威脅。馬戛爾尼則堅持如雙方無法行對等禮，就必須令獨立國使節和藩屬國使臣的謁見禮

⁴⁷ 《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533-534。

⁴⁸ 特登額等纂，《欽定禮部則例》卷一八〇，頁10；《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四三六，頁9-11；卷四三七，頁1-2。

⁴⁹ 在葉篤義翻譯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中，此句被誤譯成：「（和坤）說容他考慮之後回答特使」，見頁309。此段參見 G. L.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2:66-67.

有所區別；經進一步討論後，他聲稱也可接受另一替代方案，即用對待英王的單膝下跪加吻手禮來觀見中國皇帝。⁵⁰

徵瑞離開之後，馬戛爾尼預料清廷或將以各種小動作對使團施加壓力，旋即要代筆 (secretary) 文帶 (Edward Winder, c.1760-?) 通知僕役們，⁵¹ 如發現食料的質和量不足時，不得直接向供應者抱怨，只准報告正使，且「由於特殊的和重大的理由，此一命令必須立即執行」。當天午餐所供應的食物，即反常地少，甚至不夠半數人取用，但在正使命中國籍通事李自標 (Jacobus Li, 1760-1828) 提出抗議之後，豐盛的熱食在五分鐘之內就放在餐桌上，知清朝官員只是象徵性地表達其不快。⁵²

初七日，馬戛爾尼首度拜會和坤，雙方談了兩個小時，⁵³ 隨後，乾隆皇帝即下諭留京之王、大臣曰：

今該使臣等經軍機大臣等傳諭訓戒，頗知悔懼。本日，正、副使前來，先行謁見軍機大臣，禮節極為恭順。伊等航海遠來，因初到天朝，未諳體制，不得不稍加裁抑。今既誠心效順，一遵天朝法度，自應仍加恩視……該使臣祝慶先行回京時，王、大臣等毋庸傳見，仍令在館舍住宿，所有京中各處，前擬令其瞻仰處所及筵宴賞賚事宜，俱俟迴鑾後，再行降旨遵行……。⁵⁴

⁵⁰ Cranmer-Byng, *An Embassy to China* (1962), p. 119; G. L.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2:67-68.

⁵¹ 文帶是馬戛爾尼的母系親戚，參見 Peyrefitte, *Un choc de cultures: Le regard des Anglais*, p. cv.

⁵² 此段參見李自標於一七七三年潛往義大利南部的拿坡里中國學院 (Collegium Sinicum di Napoli; 又譯作聖家修院或文華書院) 攻讀神學，後應聘擔任英使之通事。或因擔心清政府加罪，故他在返華之後，即著歐洲服飾，特意掩飾其中國人的身分，使團更改稱他為 Mr. Plumb，此與其姓字面之英譯 Plum (李樹) 相近，清宮檔案中則據音譯稱其為「代筆婁門」。參見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頁382-383, 398-399; Michele Fatica, "Gli Alunni del Collegium Sinicum di Napoli, La Missione Macartney Presso L'Imperatore Qianlong e la Richiesta di Libertà di Culto per i Cristiani Cinesi (1792-1793)," in *Studi in onore di Lionello Lanciotti*, ed. S. M. Carletti, M. Sacchetti, P. Santangelo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96), 2:525-566; Anderson, *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pp. 142-143.

⁵³ G. T. Staunton, *Journal of a Voyage to China*, 2nd part, fol. 103.

⁵⁴ 《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13, 51, 149, 262。

指稱英使「頗知悔懼」，且「禮節極為恭順」，故可不必打發其即刻離京，一切相關事宜均待皇帝回鑾後再行處理。雖然中、英雙方對此一談判的過程和結果均諱莫如深，但和珅與馬戛爾尼應曾在此日進行了一場祕密協商，⁵⁵ 並就相關之觀禮達成協議。由於上諭中稱馬戛爾尼已「一遵天朝法度」，可以想見他如未做相當大的讓步，盛怒的乾隆皇帝應不致於公開收回前令。⁵⁶

八月初八日，馬戛爾尼獲得通知，皇帝將於初十日接見，但地點則從原擬之較正式的澹泊敬誠殿，改成戶外的萬樹園，查乾隆朝僅此一次在萬樹園接受外國使臣入覲或朝見，⁵⁷ 故此舉或是因不滿英使態度，而有意地降低接見的規格。當時隨同馬戛爾尼入覲者，除斯當東父子以及通事李自標外，還包括總兵官本生 (George Benson, c.1755-?) 等八名官紳 (gentlemen)。⁵⁸

依照馬戛爾尼貼身侍從 Anderson 的記述，⁵⁹ 初十日（西曆九月十四日）清晨三點，正使在隨員、侍從、樂手和護衛隊的伴同下起行；約五點左右，抵達目的地，馬戛爾尼下轎後，旋即將包含 Anderson 在內的所有侍從、樂手和兵士遣回，僅帶著官紳們入覲，其中只有馬戛爾尼、斯當東父子和李自標四人被引見給乾隆帝，⁶⁰「據說，皇帝用最隆重的儀禮 (with a most ceremonious formality) 接受國書」；早晨十一點，馬戛爾尼及其隨員們返回熱河住處，隨後大量御賜的禮物就送到。但觀見諸人對此一歷史性事件卻出乎常理地避而不談，以致 Anderson 語帶抱怨地稱：「然而，我們所能知道的（唯一）確鑿無疑之事，是皇帝很高興見到斯當東爵士的公子。」大家聽說皇帝對多瑪斯當東 (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以下簡稱小斯當東) 的舉止風度和精通六種語言的能力極為讚賞，還親手賜給他一把精美扇子以及刺繡的荷包。

⁵⁵ 此見劉家駒，〈英使馬戛爾尼覲見乾隆皇帝的禮儀問題〉，頁45-49。劉氏以為當時是由大學士兼軍機大臣阿桂主持此一祕密協商，雖然乾隆帝曾要阿桂對此事提供意見，但因他人在北京，故應不太可能及時介入；參見《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3, 149。

⁵⁶ 斯當東在其報告中，指稱清廷當時同意馬戛爾尼可在入覲時行單膝下跪禮，此說顯然有問題，因此舉絕無法令乾隆皇帝滿意！參見 G. L.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2:70.

⁵⁷ 此一查索借助了「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中的《高宗純皇帝實錄》。

⁵⁸ 此段參見《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149-151。

⁵⁹ Anderson, *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pp. 145-148.

⁶⁰ 原文作 "... were alone admitted into the presence of the Emperor"，中譯本稱只有此四人「進去見了皇帝」，易被誤認為使團當中只有四人觀禮。參見安德遜 (Aeneas Anderson) 著，費振東譯，《英國人眼中的大清王朝》（北京：群言出版社，2002），頁121。

八月初十日那天，使團先後在萬樹園的御道旁與大幄次（又稱帳殿或御幄）內兩度向皇帝行禮。小斯當東於其日記中，曾描述使團迎接鑾輿的到臨曰：

當我們聽說皇帝將到來時，就離開帳篷，站在御道旁。皇帝乘坐十六人抬的大轎，當他經過時，我們均跪一膝並俯首向地 (we went upon one knee and Bowed our heads Down ~~to the ground~~)。⁶¹

其中“to”字遭塗掉，“the ground”則被一筆槓掉。⁶² 依照戴廷杰的說法，“bowed our heads down to the ground”指俯首向地，“bowed our heads to the ground”才有頭觸地之意。⁶³ 由於此一描述極端敏感，或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誤解，小斯當東乃將之刪改，惟前後之文意並無明顯不同；事實上，在其原稿中屢見有將繁冗之文句槓掉的情形。亦即，此舉應非為了竄改掩飾；否則，當時儘可將此三字完全塗黑，以抹滅任何洩露原意的機會！

使團代筆文帶亦對觀見當日在御道旁的情形有所描述，現存愛爾蘭國家圖書館的文帶日誌手稿有云：

當皇帝經過時，我們被領出帳篷，在官員和韃靼王公對面排成一行。我們按中國的常規行了禮，跪地九次 (As he passed, we were led from our tent and drawn up in a line, opposite to a row of mandarins and Tartar princes. We paid our respect in the usual form of the country, by kneeling nine times to the ground)。

在此，文帶雖稱當周遭之人集體行三跪九叩之禮時（約持續一、兩分鐘，且中間還須起立兩次），英使也下跪了九次，但此應指其依照眾人九叩首的節奏跪地行禮。⁶⁴

⁶¹ G. T. Staunton, *Journal of a Voyage to China*, 2nd part, fol. 104. 又，小斯當東在日記中常有將小寫字母大寫的情形。

⁶² 在西方學者當中，Cameron 或最先注意到小斯當東日記遭到刪改；參見 Nigel Cameron, *Barbarians and Mandarins: Thirteen Centuries of Western Travelers in China* (New York: John Weatherhill, Inc., 1970), pp. 303-304.

⁶³ 戴氏對此兩描述細微處的辨析，是包含佩雷菲特在內的先前學者所未及。參見 Peyrefitte, *The Immobile Empire*, pp. 223-224；戴廷杰，〈兼聽則明〉，頁144。

⁶⁴ 此段參見 Edward Winder, *Account of a Voyage to Brazil, Tristan da Cunha and the East Indies* (1793; a copy in the MSS Division, National Library, Dublin), fol. 6；轉引自 Peyrefitte, *The Immobile Empire*, pp. 224-225.

有趣的是，在斯當東的出使報告中，卻絲毫未提及當天皇帝鑾輿經過時使團行禮的情形；⁶⁵ 在馬戛爾尼的日誌中，則稱當時中國官員均行叩頭禮，只有英國人是「單膝下跪」(kneeling on one knee)。⁶⁶ 相對於官方色彩鮮明的馬戛爾尼和斯當東父子，隨同覲見的文帶，無需將國家尊嚴念念於茲，也無需面對英國公眾可能的批評，故他的私人敘述或較接近事實。依照常理判斷，文帶沒有理由膨脹跪地次數，小斯當東或馬戛爾尼則或有意地避談次數，僅強調姿勢。

在皇帝進入御幄就坐後，馬戛爾尼即在斯當東父子和李自標的陪同下，由禮部尚書引領至寶座左首，使團中的其他官紳及較低階的中國官員雖都站在御幄入口處，但仍可清楚看到儀式的進行。在禮部尚書的指導之下，馬戛爾尼雙手高捧著裝在盒內的英王書信，拾級登上寶座所在之平臺，單膝下跪並簡短致詞後，呈遞了國書，乾隆帝親手接過後，並未閱讀，就將之交給禮部尚書，由他放在旁邊的案上。斯當東並稱該接見方式可說是一種曠典殊榮，因皇帝很少親接國書，通常是由大臣代接。⁶⁷

的確，依照乾隆朝的《欽定禮部則例》，通常外國貢使在呈遞國書時，根本不會面呈皇帝，而是在禮部設置表案行儀，國書先由正使舉授禮部館卿，再轉授禮部堂官，次日，才送交內閣；至於西洋各國之來使，如奉其國王之命，要求親獻表文者，經奏允後，則會擇期擇地召見。⁶⁸ 故乾隆帝依照西方外交禮節親手接受國書之舉，或亦是對英使的一種讓步；事實上，當英使初抵天津時，徵瑞向其要求一份國書的副本，馬戛爾尼堅稱並無副表，且因「本國王親自封鎖匣內，必須面呈大皇帝，方見至誠，此時不敢擅開」，乾隆帝當即硃批：「亦可。」⁶⁹

小斯當東在其日記中亦對御幄內發生之事有詳細描述：

使團中的官紳都站在帳篷入口處，馬戛爾尼勳爵、家父、李先生和我，則向前走到平臺的邊緣，我們像剛才那樣行了禮 (made the same ceremony as before)。接著，馬戛爾尼勳爵拾級登上平臺，呈遞了英王的信，並致送幾支做為小禮物的手錶，皇帝回贈正使一件雕刻精美的蛇形玉石（農按：指

⁶⁵ G. L.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2:75.

⁶⁶ Cranmer-Byng, *An Embassy to China* (1962), p. 122.

⁶⁷ 此段參見 G. L.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2:75-77; Cranmer-Byng, *An Embassy to China* (1962), p. 122.

⁶⁸ 德保，《欽定禮部則例》（據清乾隆四十九年刊本景印，收入《清代各部院則例》〔香港：蝠池書院出版公司，2004〕），卷一六六，頁6-7；卷一七五，頁7-8。

⁶⁹ 《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352。

如意），另一件同樣形式的白玉則贈送英王。待大使退下，家父和我就上臺，行了得體的禮（made the proper ceremony）。皇帝贈送家父一件與正使相同的玉石……並解下他身上的一隻黃色小荷包給我。他要我講幾句中文，於是我用中文感謝他的禮物。⁷⁰

他指出馬戛爾尼等人在走到寶座所在的平臺前時，曾像剛才在御幄外跪迎皇帝那樣行了禮。惟此一或許是最具關鍵性的觀見禮，卻被斯當東和馬戛爾尼完全避而不談！

同樣在場的聽事官伊登勒（Johann Christian Hüttner, 1765-1847；小斯當東的德籍家庭教師），對英使在大幄內外所行之禮的描述，亦與馬戛爾尼的口徑相近：他指稱當皇帝坐著十六人大轎接近御幄時，列隊等待的官員們齊下跪叩頭，英國使團則單膝跪地（auf ein Knie nieder），但皇帝馬上讓英使們站起來，並停留片刻與其親切交談。由於觀見儀式開始時，得先在皇帝面前行禮，引導的內廷官員（或應指禮部尚書）遂跪下叩頭，英使及其隨從則只是屈一膝（beugten bloss ein Knie）；接著，馬戛爾尼走近寶座，呈上一個內裝英王書信的金色四方匣子。⁷¹ 在此，伊登勒也呼應了小斯當東的說法，證實馬戛爾尼在呈遞國書之前，還在御幄內行了一次禮。

嘉慶二十一年（1816）七月，福建道監察御史秦繩曾奏陳他在擔任軍機章京時，嘗見到舊檔中記馬戛爾尼使團之事曰：

查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貢使初到熱河之時，不諳禮節，當經奉旨，令將熱河格外賞賜不必頒給，京中觀劇亦不必預備，照例筵宴後遣令回京……嗣因該使臣恭順行禮，仍叨宴賚有加！⁷²

指出馬戛爾尼初不願行跪叩禮，以致乾隆帝下旨取消原欲給予之格外賞賜以及京中觀劇之安排，後因英使「恭順行禮」，始又更改前令。據此，馬戛爾尼當時所行之觀禮，應已達乾隆皇帝可以接受的地步，故全程陪伴使團的王文雄，才會稱在召見英使之後，「聖意尙屬欣悅，隨分別賞賜」。⁷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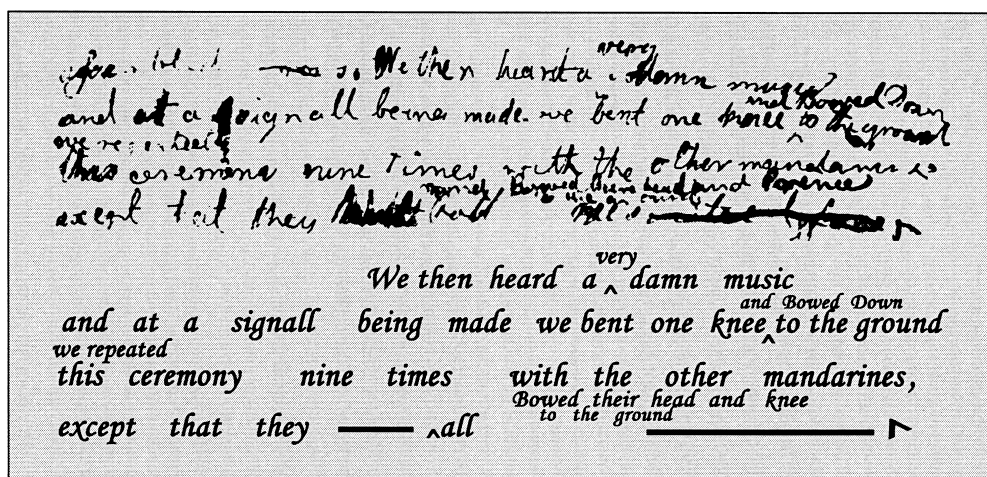
⁷⁰ G. T. Staunton, *Journal of a Voyage to China*, 2nd part, fol. 105.

⁷¹ Johann Christian Hüttner, *Nachricht von der Britischen Gesandtschaftsreise durch China und einen Teil der Tartarei* (1797; repr., Sigmaringen: Jan Thorbecke Verlag, 1996), p. 124. 感謝張國剛教授協助翻譯此書相關內容。

⁷²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第5冊，頁49。

⁷³ 《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605。

斯當東或馬戛爾尼對八月十三日（九月十七日）皇帝八十三歲壽辰時使團中人所行的儀禮著墨不多，僅稱全體祝壽之人均依令行九叩首禮，只有英人「行一種深屈膝或鞠躬禮 (made a profound obeisance)」，但皇帝自始至終隱身在澹泊敬誠殿的簾幕之後沒露面。⁷⁴ 伊登勒的書在皇帝壽辰當天的記事，沒有關於行禮跪拜的敘述。⁷⁵ 小斯當東則稱：「隨著一聲令下，我們屈一膝並俯首向地 (we bent one knee and Bowed Down to the ground)。我們與其他官員重複行了這樣的禮九次，所不同的是，他們均雙膝跪地且俯首觸地 (they All Bowed their head and knee to the ground)。」「⁷⁶ 讓人以為馬戛爾尼是行膝蓋微屈的英式禮節，惟因其中“and Bowed Down”三字是後來補插入的（圖一），亦即，該句原先應記的是「單膝跪地」。



圖一：小斯當東一七九三年九月十七日之日記，文中描述使團在澹泊敬誠殿慶祝萬壽節時所行之禮。下半部為筆者嘗試辨識出之文句。

⁷⁴ 此見 G. L.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2:88; Cranmer-Byng, *An Embassy to China* (1962), p. 131. 惟稍後有英國雜誌在提及此事時，特別將前引文句改成“made only one profound obeisance”，強調此禮僅行一次。參見“Sketch of the Reign of Tchien-Lung, Late Emperor of China; Including the Reception of Earl Macartney,” *The Britannic Magazine* 12, no. 181 (1807): 408-422.

⁷⁵ Hüttner, *Nachricht von der Britischen Gesandtschaftsreise durch China und einen Teil der Tartarei*, p. 133.

⁷⁶ G. T. Staunton, *Journal of a Voyage to China*, 2nd part, fol. 108.

雖然使團中人對儀禮的記載不一，但因他們彼此並無特殊利害關係，只是在敘述時常會不同程度地自我約束，以保全個人、使團或國家的顏面，故我們或可從各場合眾人記載的聯集（union）當中，擷取最尊之禮，做為使團在當時所行儀禮的底線。據此，使團中人應至少採行下述之妥協式儀禮，以與眾人所行的三跪九叩禮相搭配：在御幄覲見時，他們單膝下跪，而當周遭之人九次叩頭時，他們則九次俯首向地（常人在跪一膝時，很難俯首觸地並叩頭），其間並隨眾人起立兩次；在澹泊敬誠殿賀壽時，則改以屈膝並深鞠躬之禮替代單膝下跪，但仍與九叩首的眾人一樣，共行此禮九次。但必須再次強調，英使實際所行之禮可能要較他們在文字中所承認者為重。

查軍機處原本安排英使是八月初六日在澹泊敬誠殿呈遞國書，但因雙方遲遲無法就觀禮的儀注達成共識，後遂改在初十日於萬樹園覲見並呈遞國書，使團官紳們在十三日亦曾至澹泊敬誠殿參加萬壽節的祝賀禮。有學者因誤將原先擬定的覲見儀注和地點視為真實紀錄，於是認為英人故意將初十日和十三日兩次觀禮的描述顛倒，並推論當時清廷同意英使在萬樹園覲見時可行單膝下跪禮，國書的呈遞則發生在澹泊敬誠殿，且是行三跪九叩禮。⁷⁷

前述說法應與實情不合，因在稍後由禮部所編的《欽定禮部則例》當中，均稱英使是初十日進表的，雖然該書所記的地點矛盾，一稱萬樹園，一稱澹泊敬誠殿。⁷⁸ 此外，由於初十日和十三日兩天參預典禮的馬戛爾尼等十二名使團官紳，每次均於事後獲御賜禮物，但英王只在初十日才獲贈玉如意等物，因知馬戛爾尼致乾隆皇帝的國書確應於初十日呈進，雙方君主依例交換了禮物；又，在十三日的慶典場合，當天應恭進的是萬壽賀表，⁷⁹ 而不應是國書之類的公事；何況乾隆帝在萬樹園接見英使之後，旋撰有〈紅毛英吉利國王差使臣馬戛爾尼等奉表貢至，詩以誌事〉七律，其篇名即明白記稱當天英使曾進表文（即國書）。⁸⁰

在萬壽節之後，使團還有一些場合得面對儀禮問題；然而，在馬戛爾尼、斯當東、Anderson 或 Holmes 的記述中，這些卻均被略去不記。只有小斯當東依

⁷⁷ 秦國經，〈從清宮檔案看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歷史事實〉。

⁷⁸ 特登額等纂，《欽定禮部則例》卷一八〇，頁6, 10。此或因雙方對協商結果保密，未留下正式文件所致，詳見後文。

⁷⁹ 《八旬萬壽盛典》卷五三，頁6。

⁸⁰ 《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162-164, 552, 579-580；《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四三四，頁11。

舊有所描述，如他稱八月十四日，使團的官紳和侍從們應邀聽戲，他們在皇帝面前「照常行禮」(made the ceremony as usual)；八月二十六日，使團郊迎回京的鑾駕，行了「慣常的屈一膝禮」(the usual ceremony of Bending one knee)；九月初三日，使團準備離京，當閣老交給馬戛爾尼一封皇帝的覆書時，使團行了「屈單膝禮」(the ceremony of Bending the knee)；十一月十七日，英使抵達廣州，總督與一些高官向代表皇帝的香案三跪九叩，為使團的安全抵達而感謝皇恩，使團也「照他們的樣子行禮」(followed their example)；十一月三十日，當放置上諭的龍亭經過時，使團「向它下跪並鞠躬」(kneeled and bowed to it)，馬戛爾尼在接受該諭旨時則行了「應行的全禮」(all due ceremony)。⁸¹

惟小斯當東相當「狡猾」，他不直接提供所行之禮的具體敘述，而是屢用「照樣」或「照常」等詞一筆帶過，並強調使團在道迎皇帝回京或接受皇帝的覆書時均行「屈單膝禮」，不言及跪地與否。然而，經查「總管貢物官」吧龍(John Barrow, 1764-1848)的記載，使團中人在道迎皇帝回京或接受御賜禮物時，均是「單膝下跪」(bent one knee only to the ground)或「置一膝在寶座前的最低階之上」(placed one knee on the lowest step leading to the throne)；⁸²而負責組裝天算儀器的登維德(James Dinwiddie, 1746-1815)，亦記稱皇帝很高興看到使團中人「右膝跪地行了必須的禮」(made the required salutation on the right knee)，⁸³知小斯當東顯然蓄意將“to the ground”等字略去！⁸⁴

當時在軍機處擔任章京的管世銘，因參與皇帝身邊的機要工作而隨侍至熱河，⁸⁵他有〈癸丑仲夏扈蹕避暑山莊恭紀〉一詩遺世：「獻琛海外有遐邦，生梗朝儀野鹿腔；一到殿廷齊膝地，天威能使萬心降。」並自註曰：「西洋英吉利國

⁸¹ G. T. Staunton, *Journal of a Voyage to China*, 2nd part, fols. 108-109, 117, 119, 201-202, 226-227；戴廷杰，〈兼聽則明〉，頁120。

⁸² 此段參見 John Barrow, *Travels in China* (London: T. Cadell & W. Davies, 1806), pp. 116-121.

⁸³ William Jardine Proudfoot, *Biographical Memoir of James Dinwiddie, LL.D., Astronomer in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1792, '3, '4* (Liverpool: Edward Howell, 1868), p. 52.

⁸⁴ 雖然小斯當東稱使團在接受皇帝的覆書時，行了「屈單膝禮」，但因他亦稱當放置上諭的龍亭經過時，使團曾「下跪並鞠躬」，前者之儀禮實不應較後者為輕，知前者或也該是單膝下跪，而不應止於屈單膝。亦即，小斯當東可能又同樣略去了“to the ground”等字。

⁸⁵ 軍機章京掌繕寫諭旨、記載檔案並查核奏議，皇帝巡遊在外時，亦須分班扈從。參見紀欣，〈清代軍機章京述論〉，《承德民族師專學報》2004.4：56-58。

貢使不習跪拜，強之，止屈一膝；及至引對，不覺雙跽俯伏。」⁸⁶ 指出英使原只願屈一膝，但在引對的過程中，或受四週氛圍的影響，則改成雙膝下跪。以英使對觀禮的斤斤計較，他們應不太可能臨場改變原意，管世銘或不知雙方先前曾進行祕密協商，可能只爲了加強其詩作的文藝性，遂將該妥協後的儀禮說成是臨時起意。

由於管氏是這樁歷史事件可能的現場旁觀者，或至少有機會參預機務，故我們對這首爲私人目的所撰的詩，也許應給予較高的權重。事實上，馬戛爾尼究竟叩頭與否，在當時並未廣爲人知，亦不曾造成影響，故很難懷疑管世銘在敘述此一關鍵儀節時被要求造假，或爲了討好皇帝才主動說謊。⁸⁷ 然而，管氏所說的「雙跽俯伏」，不必然等同於「三跪九叩」，其字面意義乃指雙膝跪下並俯身向地，而未言及有無「叩頭」。至於管氏詩中的「殿廷」，應最可能指的是八月初十日在萬樹園中的御幄（亦稱帳殿）；此因皇帝十三日在澹泊敬誠殿時，一直未露面，亦即，並不會「引對」。

查乾隆皇帝在萬樹園接見英使後所作之〈紅毛英吉利國王差使臣馬戛爾尼等奉表貢至，詩以誌事〉七律中，有「博都雅昔修職貢，英吉利今效蓋誠」句，前者指葡萄牙曾於乾隆十八年遣使來華，詩中並有小註稱許英使曰：「該使臣去歲八月間自彼國開舟，於今歲八月初旬方抵山莊，向化之忱，可謂誠蓋。」八月十四日，賜外藩在萬樹園觀火戲後，皇帝又作〈夜雨〉一詩，中亦有「恰值祝釐叩南甸，緬甸歸誠之後，貢使頻來，今歲亦值其來山莊慶祝，俾與宴賚，不期嚮闕會西瀛，英吉利國遠隔重洋，懇祈入貢祝釐，自去歲八月間開船，至今歲七月間始到天津，萬壽節前亦至山莊，遠人效悃，亦非易得之事」句。由於詩以遣興、寄情，從這兩首作品，我們應可發現乾隆帝對英使的表現還算滿意，且兩詩中總共用了多達六個「貢」字。若馬戛爾尼當時仍堅持國家的主體性，而不願在觀禮上有相當程度的妥協，乾隆帝恐不會以「誠蓋」或「蓋誠」兩詞來稱許其「向化之忱」！⁸⁸

在沒有充分理由偏廢中英兩造任一方敘事的情形下，筆者認爲英使於八月初十日在御幄之外迎接鑾輿時，是仿三跪九叩禮的過程，單膝下跪三次，每次三俯首深鞠躬；在御幄中覲見皇帝時，則是先在寶座所在的平臺前，行雙膝下跪三

⁸⁶ 管世銘，《韞山堂詩集》（清光緒二十年重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一六，頁3。

⁸⁷ 葛劍雄，〈就事論事與不就事論事〉。

⁸⁸ 此兩詩參見《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555-556。

次、每次三俯首向地之禮；當其拾級登上寶座所在之平臺時，則以單膝下跪禮呈遞國書。而八月十三日於澹泊敬誠殿賀壽時，因皇帝隱身在簾幕之後，其禮或應與迎接鑾輿時相同。

三・嘉慶朝阿美士德使團的覲禮之爭

嘉慶二十一年，英國再度派遣使節阿美士德來華，當時喬治三世雖仍在世，但因他的精神疾病不斷發作而無法視事，故由其長子擔任攝政王子（Prince Regent），此即後來的喬治四世。這時的英國甫於歷經多年的反法戰爭中徹底擊敗拿破崙，確立其在歐洲第一強國的地位。

英使覲見清帝時應行的儀禮又再度成為兩國爭執的焦點，⁸⁹ 馬戛爾尼使團的歷史記憶遂重被喚起。先前乾隆皇帝八十三歲壽辰時，其四子當中，除皇十一子留守北京外，皇八子、十五子和十七子均隨侍在熱河；馬戛爾尼覲見當天，大部分皇族都在場觀禮，其中更有兩位皇子曾先至使團等候的客帳拜訪；⁹⁰ 知時年三十四歲的嘉慶皇帝（即皇十五子顥琰）應身歷此一歷史時刻，並見到儀式的進行。

此外，原先擔任馬戛爾尼貼身侍童的小斯當東，這次則以「男爵西雅治斯當東」的名銜，擔任阿美士德使團的左使（指第一副使）。至於當年擔任粵海關監督並在使團離華前協助招呼的蘇楞額，已歷陞至工部尚書，並被指派處理阿美士德使團相關事宜。嘉慶帝原以為蘇楞額應仍認識小斯當東（可見皇帝對該使團之事仍頗有掌握），惟因蘇楞額指稱「其面貌不甚記憶，且名字與上次不同」，以致他在初到天津時並未能認出。⁹¹

⁸⁹ 參見 Christopher Hibbert, *The Dragon Wakes: China and the West 1793-1911* (Newton Abbot, UK: Readers Union, 1971), pp. 54-69；王開璽，《隔膜、衝突與趨同》，頁153-171。

⁹⁰ 尚不確定是哪兩位，參見 G. L.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2:73, 75, 96.

⁹¹ 小斯當東初次來華時，原用「多瑪斯當東」之名；服務於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時，則用「斯當東」或「司當東」，故嘉慶皇帝要蘇楞額查明他是否即馬戛爾尼使團中副使斯當東之子。經質疑他為何前後所用名字不同時，小斯當東答稱：「西雅治是男爵之稱……多瑪是少年贊美之詞，今因襲男爵，是以改寫西雅治。」查小斯當東之全名為 George Thomas Staunton，多瑪乃其別名（middle name）Thomas 的音譯，並非「少年贊美之詞」；他雖確於其父過世後襲男爵（Baronet）之銜，但西雅治為其名（first name）

五月二十九日，嘉慶帝傳旨直隸總督那彥成和長蘆鹽政廣惠可在天津賜宴英使，稱：「令通事告知該使臣，禮應叩頭謝宴，並察看該使臣情詞是否歡感，據實奏聞。如該使臣不肯行中國禮儀，亦姑置弗論。」⁹² 但皇帝其實相當在意觀禮之事，以致他嘗諭那彥成曰：「若該貢使情詞恭順，屆時率領入覲。倘其意在要求，或禮節不遵制度，即據實奏聞……即在天津筵宴，遣回本國，均無不可。」並在派遣蘇楞額前往天津時，面諭曰：「務將該貢使等禮節調習嫻熟，方可令其入覲，如稍不恭順，即令在津等候，毋庸亟亟起程來京。」⁹³

閏六月二十日，英使在天津接受御賜筵宴，雙方曾在宴會前後兩度就相關儀禮進行冗長討論，當中、英官員在香案前望闕謝恩時，據隨團醫生亞比利 (Clarke Abel, c.1780-1826) 的記載，中國人均行三跪九叩禮，阿美士德等人則順著叩首的節奏「恭敬地鞠躬九次」(bowed respectfully nine times)。⁹⁴ 在阿美士德未發表的日誌中，亦稱當中國人跪下時，他是脫帽竦立；當中國人叩頭時，他是深深俯首並虔敬鞠躬 (made a very low and reverential bow)；⁹⁵ 當中國人起立時，他則覆帽；如是，又再重複兩次；此應即清宮文獻中所稱的「向上三免冠、九拜揖、九俯首」。⁹⁶

當被詢及覲見皇帝將行之禮時，阿美士德初稱他奉命只能遵照馬戛爾尼之例，行單膝下跪的英式禮節，他還曾應欽差的要求，請其姪子貴米斯阿美士德 (Honorable Mr. Jeffery Amherst, c.1803-?) 對其演示單膝下跪且吻手之禮；但在壓力之下，正使聲稱願意自負責任，在入覲時改行其姪所演示之禮九次，以表達對

George 的音譯，亦非男爵之稱。小斯當東更改漢名之舉，恐是為了避免被牽扯入馬戛爾尼使團的不愉快記憶，故在被發現之後，只好胡謔一些理由搪塞。此段參見跛臣 (Alexander Pearson) 著，斯當東 (George Thomas Staunton) 譯，《英吉利國新出種痘奇書》(*The Extraordinary History of a New Method of Inoculating Discovered in the Kingdom of England*) (清嘉慶十年刊本，英國皇家學會藏)；《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4冊，頁24-28；第5冊，頁8-9；《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455-457, 512。

⁹² 《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206-207。

⁹³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文獻叢編》（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64），上冊，頁344, 352。

⁹⁴ Clarke Abe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and of a Voyage to and from That Country, in the Years of 1816 and 1817* (London: Longman, etc., 1818), p. 83.

⁹⁵ 筆者未得見阿美士德的日誌（私人收藏），轉引自 Hibbert, *The Dragon Wakes*, pp. 62-63.

⁹⁶ 《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5冊，頁32。

中國皇帝的敬意。⁹⁷ 嘉慶皇帝對阿美士德在天津望闕謝恩時所行之禮相當不滿，硃批稱此次尤甚於馬戛爾尼之時！⁹⁸ 其實，如依斯當東的記述，他們上次在天津時也只行了深鞠躬禮。

雖然阿美士德仍未同意跪叩，蘇楞額和廣惠卻因擔心誤了欽定的期限（閏六月二十八日帶赴北京，七月初二日在正大光明殿進表），遂趕在二十一日即帶領使團啓程，希望能於途中再加以開導。⁹⁹ 此舉遭到皇帝的嚴斥，並要求蘇楞額和廣惠告知小斯當東曰：

爾曾於乾隆五十八年隨貢使來至天朝，一切瞻觀宴賚禮儀，俱經目覩，其時先朝大皇帝不准爾國使臣行本國之禮，嗣經三跪九叩頭，始蒙恩賚駢蕃，禮遣回國，當今大皇帝事事恪守先朝制度，爾等不肯遵行中國禮儀，斷不准爾等瞻觀，我等亦不敢具奏。天朝定制……來京朝覲者，皆行三跪九叩頭禮，從無有敢違定制者，至於免冠，乃有過者之禮，中國朝見時無此儀文。

且要兩位欽差告知阿美士德，必須先將三跪九叩之禮在兩人面前演習嫻熟後，始敢帶領進京，如對方執意不從，則將把使團原船送回。又稱若英使將來在進表之日，行禮仍不如儀，不僅將立刻遣出宮門，押回天津遣返，還立將蘇楞額和廣惠革職，拏交刑部治罪；更硃批曰：「與其到京逐回，不若中途轉回為妙。朕實不願受此虛譽，有損國體也。若至園後，日勞唇舌，皆汝二人之罪，彼時毋悔！」¹⁰⁰

蘇楞額和廣惠於是即刻停船面見阿美士德和小斯當東，恩威並濟地加以開導。稍後，據譯生瑪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¹⁰¹ 傳阿美士德之話曰：

貢使等由海外遠來，實不敢稍存不恭順之心，況天朝定制，敢不遵依，又蒙大皇帝恩典，心中實在感激，但不敢私自更改本國禮節，將來回國時必

⁹⁷ 許多中、英文獻均稱阿美士德攜子來華，然據阿美士德的日誌，此一少年似為其姪，但或為提高其地位，對外均以己子稱之。參見 George Thomas Staunton, *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g in 1816* (London: private circulation, 1824), pp. 50-51; Hibbert, *The Dragon Wakes*, p. 63.

⁹⁸ 《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5冊，頁37。

⁹⁹ 中國官員在途中確曾就觀禮問題不斷向阿美士德施壓，阿美士德亦曾告知使團人員要做被遣返的最壞打算；參見 Abe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pp. 86-96.

¹⁰⁰ 此段參見《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210-211。

¹⁰¹ 今譯馬禮遜，其事跡可參見蘇精，《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

然重治我等之罪……據西雅治斯當東云：「乾隆五十八年來時，所有禮節雖經目覩，實係年幼不記得。」……前所說跪一膝一俯首之禮，貢使等所到各國從無行過，今情願加行九數，並非違背不從三跪九叩之禮，實係不敢私改我國王禮節。¹⁰²

阿美士德一方面聲稱不敢「私自更改本國禮節」，另一方面則又詳加辯解，指英國的禮節是「遇貴官、尊者，係免冠、拱立、一俯首；在國王前，係免冠、跪一膝、一俯首；如向國王之位，係免冠、拜揖、一俯首，是極大之禮」，但為感念皇帝的恩典，他願在覲見時行「九跪一膝、九一俯首」之禮，惟其所建議的妥協方案仍與先前在天津時所應允的尺度相同。¹⁰³

由於小斯當東在日記中對覲見之事著墨頗多，且其日記迄今尚存於 Duke 大學，故很難想像身為此歷史性事件的當事人之一，他會忘記馬戛爾尼究竟採行何種觀禮！小斯當東當時還曾對蘇楞額辯曰：

上次來朝僅十二歲，回去時即跟回本國，如今已隔二十三、四年，不但所行禮節全不記得，就是大人也不認得了！後來到過廣東貿易，所以也畧懂得些中華的言語。¹⁰⁴

聲稱即使是先前曾在廣州見過的蘇楞額，現在也已記不得了，何況是二十多年前所行之禮節。

然因小斯當東又云：「乾隆五十八年貢使等來朝，回國時聞得正使告知國王云，係照依本國禮節行禮，是以此次不敢更改……實係不能記憶，且與正使同來，不敢自專。即告知正使，伊亦不敢改易本國禮節。」¹⁰⁵ 知他實在患了選擇性的「政治失憶症」。無怪乎，當蘇楞額和廣惠在其奏摺中引述小斯當東「所行禮節全不記得……」等言詞時，親歷馬戛爾尼使華事件的嘉慶皇帝，即在旁邊兩處地方加上「支吾可惡」和「所言甚屬欺誑」之硃批！¹⁰⁶

在持續的壓力之下，阿美士德改同意可有條件地行三跪九叩禮：只要在其入覲時或之前，由一同等位階的清朝大臣向英王肖像行此禮；或是嘉慶皇帝在其入

¹⁰² 《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510。

¹⁰³ 《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5冊，頁29-30。

¹⁰⁴ 《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512-513。

¹⁰⁵ 同前書，頁510。

¹⁰⁶ 此段參見前書，頁511-513。

觀前下旨，清廷將來如遣使至英國時，願向英王行三跪九叩禮。但欽差們認為此一建議完全不可行，他們甚至不敢將之上奏。¹⁰⁷

由於清廷的態度相當堅持，閏六月二十四日，英使聲稱願將原建議的「九跪一膝、九一俯首」之禮再做改變，其言曰：

如今請跪一膝、三俯首，如此三次，與三跪九叩之禮似相仿照，並非不行三跪九叩之禮，較之本國之禮，已為加增數倍，實不敢跪雙膝，自改國王之制，婉請轉代奏求大皇帝恩典。至演禮一節，貢使等不敢欺國王，更不敢欺大皇帝，將來入朝時，必如所說行禮，斷無更改。¹⁰⁸

亦即，英使原本建議在單膝下跪後，連續深鞠躬九次，現願改成類似中國式的三跪九叩禮，在單膝下跪後，深鞠躬三次，起立，如此重複共三次。

鑒於蘇楞額和廣惠兩人無法令英使在覲禮上就範，嘉慶帝遂又指派理藩院尚書和世泰、禮部尚書穆克登額至通州處理此事。閏六月二十五日，更命和、穆兩人曉諭英使曰：

至司當東於乾隆五十八年曾隨伊父入貢，彼時貢使等欲行本國之禮，略加開導，旋即遵行三跪九叩禮儀，司當東曾經目覩。今伊再至天朝，何得諉為不知！至爾所云「前次貢使回國時，告知爾國王仍稱行本國禮節」，爾等回國如何告知爾國王，我天朝都置之不問。¹⁰⁹

直指斯當東父子推諉說謊。七月初一日，又下諭：

和世泰等自己向該貢使等反覆開導，如該貢使已敬謹遵依當面演行三跪九叩之禮，無論何日，一面奏聞，一面即帶領進京。若該貢使執意不從，總以本月初六日為斷，據實奏聞，候旨飭辦，無庸頻將開導情形陳奏瀆聽也！

言語間已對此事頗感不滿和不耐，並要求英使務必在初六日以前確實於通州練習三跪九叩之禮。¹¹⁰

當時使團中人曾就此事展開激烈討論，其中譯生瑪禮遜以及右使（指第二副使）咸利依禮士（Henry Ellis, 1777-1855），¹¹¹ 均與阿美士德的意見一致，傾向屈

¹⁰⁷ G. T. Staunton, *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g in 1816*, pp. 62-63.

¹⁰⁸ 《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5冊，頁39。

¹⁰⁹ 《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212。

¹¹⁰ 此段參見《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5冊，頁45。

¹¹¹ 《清史稿》中誤稱：「貢使羅爾美都、副貢使馬禮遜」；參見趙爾巽等，《清史稿》（點

從清廷的要求，但隸屬於東印度公司的六名官紳當中，有四人強烈反對。由於一七九五年入觀的荷蘭使團，雖在相關場合均跪叩如儀，但並未獲得任何明顯的政經利益；¹¹² 一八〇五至〇六年來華的俄羅斯使團，在抵達蒙古邊境後，雖因不願向代表皇帝之香案行三跪九叩禮而遭遣返，¹¹³ 惟亦不曾影響到中、俄兩國的貿易往來；故最後小斯當東遂得以從個人與國家尊嚴的角度說服大家不應行跪叩禮。¹¹⁴

和世泰、穆克登額和廣惠三人在與英使就此事相商時，曾指出孔子有「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之語，中國的皇帝即是天之子，故萬王都該臣服；阿美士德則回稱中國皇帝雖是世上最偉大的統治者之一，但英王亦自認如此，故他只能行馬戛爾尼在乾隆帝面前所行之儀禮。阿美士德指稱和世泰等人並未直接駁斥他所提馬戛爾尼曾行英式觀禮的說法。¹¹⁵ 小斯當東亦稱蘇楞額和廣惠先前也承認馬戛爾尼並未在熱河觀見時行叩頭禮，但後二人仍堅稱因乾隆皇帝十分不悅，馬戛爾尼遂在稍後回到北京時補行此禮。¹¹⁶ 這些對馬戛爾尼觀禮之爭的說法，應屬當時雙方在協商時角力的策略之一，或只是使團中人事後對外的說詞，其可信度均應存疑。同樣地，中國官員有稱馬戛爾尼在廣東和北京均行跪叩禮，亦有稱其在入觀時行歐洲禮節，但在萬壽節時行叩頭禮，此亦應是談判時的手腕，而不必然為事實的陳述。¹¹⁷

從馬戛爾尼在回國後向其政府所作的公開報告中，我們可發現他只承認在呈遞國書時行一次單膝跪地的英國禮，而完全未提及先前所行之雙膝跪地的三跪九

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一五四，頁4516-4517。

¹¹² J. J. L. Duyvendak, "The Last Dutch Embassy to the Chinese Court (1794-1795)," *T'oung Pao* 34.4 (1938): 1-137.

¹¹³ 此一由 Alexander I (1801-1825年在位) 所派遣的使團，是由 Iurii A. Golovkin (1763-1846) 擔任正使。該團遭遣返一事，或對阿美士德使團應否跪叩產生相當大壓力。參見 Clifford M. Foust, *Muscovite and Mandarin: Russia's Trade with China and Its Setting, 1727-1805*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9), pp. 323-329.

¹¹⁴ Henry Ellis,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ate Embassy to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1818), 1:258-260; Abe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pp. 101-103; G. T. Staunton, *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g in 1816*, pp. 101-103.

¹¹⁵ Abe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pp. 356-357.

¹¹⁶ G. T. Staunton, *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g in 1816*, p. 54.

¹¹⁷ Ellis,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ate Embassy to China*, 1:152-153, 167.

拜觀見禮。¹¹⁸ 身為歷史見證人的嘉慶皇帝和小斯當東，或為在談判中爭取較大利益，遂各自往自己的方向將史實加以扭曲。對嘉慶帝而言，他所見馬戛爾尼行之觀禮已趨近三跪九叩，故他命蘇楞額如發現英使在行禮時有舛錯之處，「可以五十八年舊儀向其（農按：指小斯當東）詰責，自當敬謹遵循」。¹¹⁹ 事實上，此一態度亦間接印證馬戛爾尼大概不會只會單膝下跪，否則嘉慶皇帝大可不必以馬戛爾尼事件做為談判的參考點，他很可以堅持乾隆朝之事僅為特例！

惟因嘉慶皇帝嘗在七月初三日諭旨曰：

該貢使等僻在荒夷，其於中國禮節原不能中規合度。此時總令該貢使等遵依行三跪九叩之禮，即起跪之間稍覺生疏，均無足深責，將來行禮時，亦必派員帶領，始克如儀……。

並硃批曰：「凡事不可過於苛細，轉失馭外之禮，即五十八年亦係將就了此一事耳。總之，逐回不如接見之為是。」¹²⁰ 口氣已不再那麼堅決，指稱只要儀節大致看得過去，即可讓英使入覲。其中的「將就了此一事」等字，或許是解開乾隆朝英使觀禮之謎的重要關鍵，因從其語意知馬戛爾尼所行之禮應非道地的三跪九叩，¹²¹ 此亦間接佐證了筆者在前一節中所提的假說：乾隆帝為避免談判破裂，曾將就了事，同意免除英使在三跪九叩禮中叩頭至地的敏感動作。

七月初五日上午，阿美士德以書面通知和世泰，正式拒絕在觀見時三跪九叩；當天下午，和世泰親訪阿美士德，宣稱皇帝已同意免除其跪叩禮，並要使團在翌日起行進京。¹²² 同日，和世泰及穆克登額等呈稱英使在經開導後同意練習禮節，奏疏中形容其「起跪不甚自如，勉力尙堪成禮」。初六日清晨約四點半，使團動身進京，途中獲暗示皇帝可能提前至初七日早上接見；近午夜時分，使團入城，九門提督還奉命不關城門以迎接來使；次日近五點，抵達圓明園，旋即接到通知必須於當天早上覲見；阿美士德於是以其旅途勞累、身體不適為藉口，並聲稱禮服還未運達，希望能推遲一天，於原訂的初八日入覲。¹²³

¹¹⁸ Pritchard, "Letters from Missionaries at Peking Relating to the Macartney Embassy," p. 23; G. T. Staunton, *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g in 1816*, p. 50.

¹¹⁹ 《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512。

¹²⁰ 《文獻叢編》上冊，頁357。

¹²¹ 先前學者亦注意及此，參見 Pritchard, "The Kotow in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in 1793."

¹²² Abe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p. 97.

¹²³ 同前書，頁99-104；Ellis,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ate Embassy to China*, 1:265-270;

由於阿美士德在通州時其實不曾認真演行三跪九叩之禮，故當嘉慶帝於初六日下午先行召見和世泰及穆克登額，詢問相關事宜時，兩人或擔心遭嚴懲，遂免冠叩首稱：「實不能令該使臣演禮，明日瞻覲時必能成禮，不致失儀。」¹²⁴

依照軍機處於初六日所擬的〈英貢使瞻覲儀注〉，皇帝將在初七日於正大光明殿接見英國正、副使以及十四歲的正使之子，但其過程並未安排使節與皇帝有近距離之接觸，如嘉慶帝預備頒賞給英王的如意，即是擬由御前大臣鄂勒哲轉交，最後則由侍衛帶領英使向上行三跪九叩禮。¹²⁵

初七日卯時（上午五點至七點），當嘉慶帝將入正大光明殿召見時，已至宮門的正、副使三人竟然先後託病拒絕上殿謁見；在蘇楞額和廣惠兩人柔性勸說無效的情況下，和世泰懷疑阿美士德擔心的是觀禮之事，遂強調入覲時可依「你們體例」，並粗魯地拉他手臂，雙方人馬幾乎因此釀成肢體衝突；於是，阿美士德堅持要先回行館休息；由於和世泰以正使生病為由，皇帝遂同意取消當天的接見，並派御醫探視其病情；但因醫生檢查後認為正使並無大恙，嘉慶帝一怒之下就命使團即刻離京，並拒收其禮物，且稱：「嗣後毋庸遣使遠來，徒煩跋涉！」¹²⁶

由於清廷臨時將覲見行程提早一天，且不再堅持跪叩禮，並只召見阿美士德父子、小斯當東、威利依禮士等四人，令英人懷疑嘉慶皇帝原僅視此為私人接見，而非正式之瞻覲暨呈遞國書的場合；據瑪禮遜和小斯當東聲稱，全程陪伴使團的天津兵備道張五緯稍後告訴他們，在和世泰的建議之下，嘉慶帝該次在圓明園原本只想乘輿經過使團，以觀察英使如何行禮，如令其滿意的話，始在次日安排正式接見；嘉慶帝亦願意將就接受阿美士德所建議之禮，因在英使所穿長袍禮

James Dennison, *The Journal of a Voyage to China in H.M.S. Alceste* . . . (1816-1817; a copy in the McGill University Libraries, Quebec), fol. 19; G. T. Staunton, *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g in 1816*, pp. 109-119; 《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5冊，頁50-51。其中只有小斯當東強調國書亦不在阿美士德身邊，因這個理由遠較身體不適或禮服未到重要，理應被大家提及，故筆者頗疑國書未到之說的真實性。

¹²⁴ 《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5冊，頁55, 57。

¹²⁵ 同前書，第5冊，頁52。

¹²⁶ 此見《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213-214；Abe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pp. 105-113; G. T. Staunton, *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g in 1816*, pp. 119-125.

服的掩蓋之下，如何下跪並不易辨別。¹²⁷再者，因大學士托津於七月初七日奏稱：「英吉利使臣本係化外遠夷，生性愚昧。此次奉表進貢，若於瞻覲一切儀節稍有未嫻，我皇上懷柔遠人，斷無不加體卹。」¹²⁸亦知，嘉慶皇帝在召見英使時，並未準備強迫其行三跪九叩之禮，只不過整個過程相當粗糙，未給予對方應有之尊重，或許其本意就是要讓英人措手不及，並被迫屈從。¹²⁹

然而，事態的發展卻因阿美士德的強烈反應，超乎清廷事前的評估。嘉慶皇帝因此相當懊悔，旋即自找台階，嚴斥和世泰及穆克登額在英使未演禮的情形下，即「一味姑息，將就了事，徑自帶來」，故在初七日諭旨曰：

所有該貢使等由通州至京及本日遣回由京至通州一應供支，並著罰令和世泰、穆克登額分賠示懲。朕惟自責不能知人，屢違諭旨，以致外國使臣干犯名義，成何事體，不能不執法矣！¹³⁰

並於初八日提出另一說詞，稱有廷臣報告，英使在歷經一日夜旅程抵達圓明園時，不僅形色疲憊，且連裝載覲見禮服的車子均落後未至，故他指責和世泰為何不在初六日未時面奏時即說明此一情形，其言曰：

即或遺忘，或晚間補奏，或次日一早具奏俱可……若預先奏明，必改期召見，成禮而返。不料庸臣誤事至此，朕實無顏下對臣工，惟躬自引咎耳！¹³¹

知嘉慶帝對此事的成敗實在頗為看重。然而，和世泰等人或有些無辜，因他們何能在初六日下午面奏時，即可預知英使於次日入覲時禮服還未運到！

嘉慶皇帝為對阿美士德使團稍加安撫，遂決定收受其所進的部分禮物，並回贈英王白玉如意等物，但在致英王的敕諭中，他仍重申乾隆朝來華的英使均「恪恭成禮，不愆於儀」；更通令以後若再有英使來華，只可暫留廣東，不必來京；並將小斯當東視為此次事件中撥弄是非的罪魁禍首，永不許其再來；而經理此事的主要官員均遭降罰。¹³²

¹²⁷ G. T. Staunton, *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g in 1816*, pp. 126, 139-140, 143.

¹²⁸ 《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5冊，頁56。

¹²⁹ W. Adams, *The Modern Voyager and Traveller through Europe, Asia, Africa, & America* (London: Henry Fisher, Son, & P. Jackson, 1828), 2:331-332.

¹³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第21冊，頁386。

¹³¹ 同前書，第21冊，頁388。

¹³² 和世泰遭革去理藩院尚書、鑲白旗漢軍都統、鑾儀衛掌衛事等職銜，罰公俸五年；穆克

嘉慶皇帝在震怒之下，仍欲呈現「懷柔體恤之意」，諭令英使回國途中所經各省的官員均當待之以禮，並應按舊例在廣州賜宴，至於其回國所買之茶、絲等貨品，以及所應交之一萬多兩稅款，亦俱優待免納，因「使臣無大咎，皆庸臣和世泰一人之咎」！¹³³ 嘉慶皇帝稍後雖曾要兩廣總督蔣攸銑提供是否停止英國貿易的意見，但由於當時粵海關每年約收稅銀一百二、三十萬兩，其中單單英國就佔了九十餘萬兩，或因茲事體大，終未採取任何動作。¹³⁴

英國使團的滿腔怨怒，在到達廣州之後終於爆發開來。旗艦 *Alceste* 號的船長 Murray Maxwell (1775-1831)，為避免風浪的折騰，希望能將船駛入較平靜的虎門海面。他聲稱有一中國官員答應向總督稟報，並告知將在五天內回覆，惟因過了期限後，仍未接獲任何訊息，他遂逕行起錨，旋遭清朝水師阻攔，雙方於是發生武裝衝突。安有四十六門砲（大者可發射三十二磅砲彈）的 *Alceste* 號，曾以右舷各砲排放，令虎門砲臺完全無法還擊；然而，總督卻因擔心受到懲處，忍辱祕不上報，並允許英船入港。¹³⁵ 歷史在此又再度呈現不同表述：當中國文獻略去此事時，英人卻盛讚 Maxwell 勇敢維護了大英帝國的尊嚴。¹³⁶ Maxwell 以堅船利砲為後盾所採取的行動，或亦是稍後西方列強在華所用「砲艦外交」的濫觴。馬戛爾尼就曾在其日記中狂傲地宣稱，只要舷砲齊發六次左右，即可將虎門砲臺摧毀，並封鎖廣州的水路交通！¹³⁷

在阿美士德遭遣返之後，廣東巡撫孫玉庭恰因擢授湖廣總督而陛見，嘉慶帝遂命他說明英國的情形。孫氏指稱：

乾隆五十八年，該夷專遣貢使航海至天津貢方物，彼時夷使到京，即聞其不能效中國跪拜之儀。至嘉慶九年，臣於廣東巡撫任內，適逢有答賞該國王之物，會同督臣傳該國大班名司當冬者入見，吏役引至大堂前站立，該

登額革禮部尚書、鑲黃旗漢軍都統，降補鑲藍旗漢軍副都統；蘇楞額革工部尚書、鑲紅旗漢軍都統、管理造辦處，降補工部左侍郎；廣惠降為內務府八品筆帖式。參見《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21冊，頁390-400。

¹³³ 《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6冊，頁5, 10-11, 25, 34。

¹³⁴ 同前書，第6冊，頁11-13。

¹³⁵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3:305-306; Basil Hall, *Voyage to Loo-Choo and Other Places in the Eastern Seas, in the Year 1816* (Edinburgh: Archibald Constable & Co., 1826), pp. 268-286.

¹³⁶ *A Delicate Inquiry into the Embassies to China, and a Legitimate Conclusion from the Premises* (London: Thomas and George Underwood & J. M. Richardson, 1818), pp. 11-12.

¹³⁷ Cranmer-Byng, *An Embassy to China* (1962), p. 211.

夷摘帽弓身俯伏……方該夷入見時，見其兩腿褲襪繃緊直立而不能曲，其俯伏者，即夷禮之免冠頓首也。今屆貢使即係司當冬，豈有在廣東則恭謹，到京師反敢崛強者乎！¹³⁸

其中頓首原指叩頭，但由於孫玉庭又強調英人因紮腿而不能彎膝，不知小斯當東在嘉慶九年時是否只是在脫帽之後深深彎腰鞠躬（此即二十一年他在大沽接受恩旨時所行之禮）？有學者誤以孫氏前述的言詞可用來印證馬戛爾尼未行跪叩禮，其實，前引文只提及馬戛爾尼初到北京時尚不能行跪拜之儀，而未言及馬戛爾尼在熱河所行之禮。¹³⁹

由於孫玉庭嘗稱：「（英吉利國）不得茶葉，則人皆病目，我能制其死命，彼必畏懼。況彼國之船過大，內洋水淺，斷不能進；且最怕火攻，無能為也！」¹⁴⁰ 知其對外國事務頗乏見識，然而，孫氏的言論和觀點在此事件中仍然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他自稱曾向皇帝疏陳：「彼（英吉利）如妄有干求，必當折以天朝之法度，若勢有不能，不必責以中國之儀文。」經其「反覆開陳」，結果「上意大悅，優旨褒嘉」，¹⁴¹ 直指嘉慶皇帝後來的態度緩和，乃肇因於他的勸諫。

阿美士德使團在返國途中，曾順道拜見被拘禁於聖赫勒拿（St. Helena）島的拿破崙。拿破崙認為中國皇帝有權要求英使叩頭，因為這些使節並不代表本國國王，他們在國外所受的待遇，只應相當於該出使之國最高階之王公；但如中國遣使他國，也必須以相當於王公的身分行當地的覲禮。拿破崙明白主張應入鄉隨俗，「在義大利，你吻教皇的腳趾，但這並不被視為丟臉」，他更對其親信笑稱：「如果英俗是親吻國王的屁股，而不是他的手，是否也要中國皇帝遵從英國

¹³⁸ 孫玉庭，《寄園老人自記年譜》（據清道光間刊本景印，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頁29。

¹³⁹ 此出自戴廷杰之說，其文曰：「這位孫大人堅定的言詞成了我們搜集到的見證中最關鍵的部份……孫玉庭告訴皇帝，乾隆五十八年英國前來納貢，貢使『已不能效中國跪拜之儀』。他又說，托馬斯·斯當東向乾隆皇帝賜給該國國王的禮品敬禮時，僅脫帽俯首而已，這是他親眼所見……嘉慶皇帝聽後並無絲毫不悅，這就不但證明，嘉慶在敕諭中說的不是實話，而且也證明，馬戛爾尼在熱河未行跪叩禮的實情，早已是公開的祕密了。」惟其所言小斯當東脫帽俯首向皇帝賜給英王的禮物致敬一事，發生在嘉慶九年，而非戴氏所稱的乾隆朝！參見戴廷杰，〈兼聽則明〉，頁128-129。

¹⁴⁰ 《寄園老人自記年譜》，頁29。

¹⁴¹ 同前書，頁30-31。類似記載亦見於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卷三三四，頁10745。

的規矩而脫下褲子呢？」拿破崙反對英使欲以武力強迫中國遵守歐洲禮節的想法，他更希望天朝能壓壓英國的氣焰。¹⁴²

四・圖像、印象、真相

前述中、英兩國在清代所爆發的觀禮之爭，當然與權力的傲慢脫不了關係。清前期來華的許多西方國家使節即屢屢因被要求三跪九叩，而產生極端反感，甚至弄得不歡而散。¹⁴³ 然而，我們在英國東印度公司 *Stringer* 號船長 Isaac Pike 所出版的日誌 (1712) 中，也可見到另一面向。該書書首插圖的左邊，有兩隻獸頭魚尾的怪物，共同舉著該公司的盾形徽識，旁可見兩名英國人持槍護衛，前則有三名東方人恭敬行禮，其中著中國服飾者，雙膝跪地，兩手合十作膜拜狀（圖二），¹⁴⁴ 此畫強烈呈顯出英國人自認高人一等的心態，及其憑恃武力以護持權益的霸氣。

一幅生動傳神的圖像往往勝過千言萬語，更容易令閱讀者產生直接且深刻的「紀實」印象。馬戛爾尼使華或許是尚存大量圖像資料最早的一樁中國史事件，隨團畫師額勒桑德約仍留下近千幅相關畫作，僅僅在大英圖書館的東方暨印度部門 (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 即藏有八百七十幅。¹⁴⁵ 由於該次出使揭開中國許多神祕面紗，坊間遂出現十多種以各種語文出版的遊記、畫冊或報告，這些著述的圖像大多源出額勒桑德。¹⁴⁶ 此一圖文搭配的方式，令十九世紀前半葉的西方人，對中國社會有了較先前清晰的認識。¹⁴⁷

¹⁴² Peyrefitte, *The Immobile Empire*, pp. 512-5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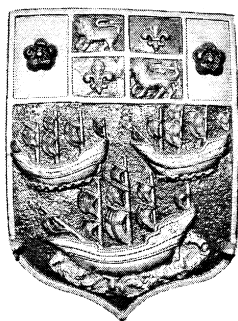
¹⁴³ 王開壘，《隔膜、衝突與趨同》，頁61-113。

¹⁴⁴ Antony Wild, *The East Indian Company: Trade and Conquest from 1600*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9), frontispiece.

¹⁴⁵ Frances Wood, "Closely Observed China: From William Alexander's Sketches to His Published Work," *British Library Journal* 24.1 (1998): 98-121.

¹⁴⁶ 黃一農，〈龍與獅對望的世界〉。

¹⁴⁷ Jeng-Guo S. Chen (陳正國), "The British View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Class Consciousness,"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45.2 (2004): 193-205.



圖二：英國東印度公司船長 Isaac Pike 日誌 (1712) 中的書首插圖（右）。

圖左為該公司當時所用之徽飾。¹⁴⁸

然而，做為一位歷史工作者，除了在研讀文本時，要掌握字面所呈現的內容，並嘗試去揣摩或追索書寫者的心境或心態，以發掘字裡行間或文字背後的深層意涵之外；¹⁴⁹ 當我們在解讀歷史繪畫 (history paintings)，¹⁵⁰ 尤其是涉及敏感的歷史解釋時，也必須試圖瞭解作者掌握場景的確實度，甚至有必要知道繪製者、贊助者或背後主事者對該事件的立場。

查額勒桑德的畫作當中，包含多幅使團謁見乾隆皇帝之圖。其中所繪皇帝抵達萬樹園御幄之前的水彩畫，至少還有六幅存世，¹⁵¹ 主要構圖大致相同：在七

¹⁴⁸ 出自 Anthony Farrington, *Trading Places: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Asia 1600-1834*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02), p. 21.

¹⁴⁹ 如見黃一農，《兩頭蛇》，頁253-285。

¹⁵⁰ 依照英國國家藝廊 (The National Gallery) 對歷史繪畫的定義，這類畫作的尺寸常較大，擁有嚴肅的敘事體，但不必然是真實故事的描述，其內容出自聖經、神話、文學作品或歷史事件，也可以是寓言式的。自十六世紀起，歷史繪畫被許多學院派畫家視為創作的極致，其地位等同於文學作品中的史詩或悲劇。

¹⁵¹ Susan Legoux, "Lord Macartney's Audience with the Emperor of China," *Connoisseur* 200, no. 804 (1979): 122-127.

名官員以及華蓋的前導下，皇帝坐在十六人抬的步輿之上，準備轉入御幄；然而，所繪英使的位置則有較大差異，人物的細膩度亦不同。圖三上左圖為一未完成之草圖，現藏大英圖書館，使團成員乃排成一行，站在面對御幄的右側，其前有中國的樂手，御幄的左側亦站列著一排中國官員，此與文帶的敘述頗為接近；倫敦 Martyn Gregory 藝廊所擁有的一幅較細緻之水彩畫，似源出於此。¹⁵² 至於中圖，乃 G. Nicol 印製的版刻（手工著色，30×45cm），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斯當東報告三冊本之圖冊（W. Bulmer & Co., 1797），此乃一七九六年由 James Fittler 根據現藏 Indianapolis 美術館的額勒桑德水彩畫所刻，在其右下最靠近畫紙邊緣處可辨出約八名英人，而鑾輿的前導官員正經過他們面前；下右圖則為大英博物館所藏額勒桑德水彩畫的局部放大。

若細看各個人物的臉龐，我們可發現上左圖較下左圖粗糙，而下右之水彩畫又較下左圖細膩。經比對馬戛爾尼和斯當東的肖像畫，¹⁵³ 可確定他們就是站在下右圖最前面的兩人。對照郎世寧等人先前所繪之〈萬樹園賜宴圖〉（1755），¹⁵⁴ 可發現圖三出現不少細節上的錯誤。如額勒桑德在畫御幄兩側的圓形客帳時，所取之透視點（perspective）即過高。¹⁵⁵ 又，額勒桑德所畫皇帝穿著之袞服，僅胸前有一團形圖案；依制，該服在胸前、背後和兩肩皆應繡有團狀花紋。再者，圖三中前導御駕之侍衛所著的補服方圓不一；按理，圓補僅宗室可用，一般侍衛所著的補服均應從武官之方補。¹⁵⁶ 此外，由於乾隆帝乃於清晨接見英使，而御幄的出口應朝南，故圖三所有影子的方向全畫反了！亦即，郎世寧的畫作要較額勒桑德寫實的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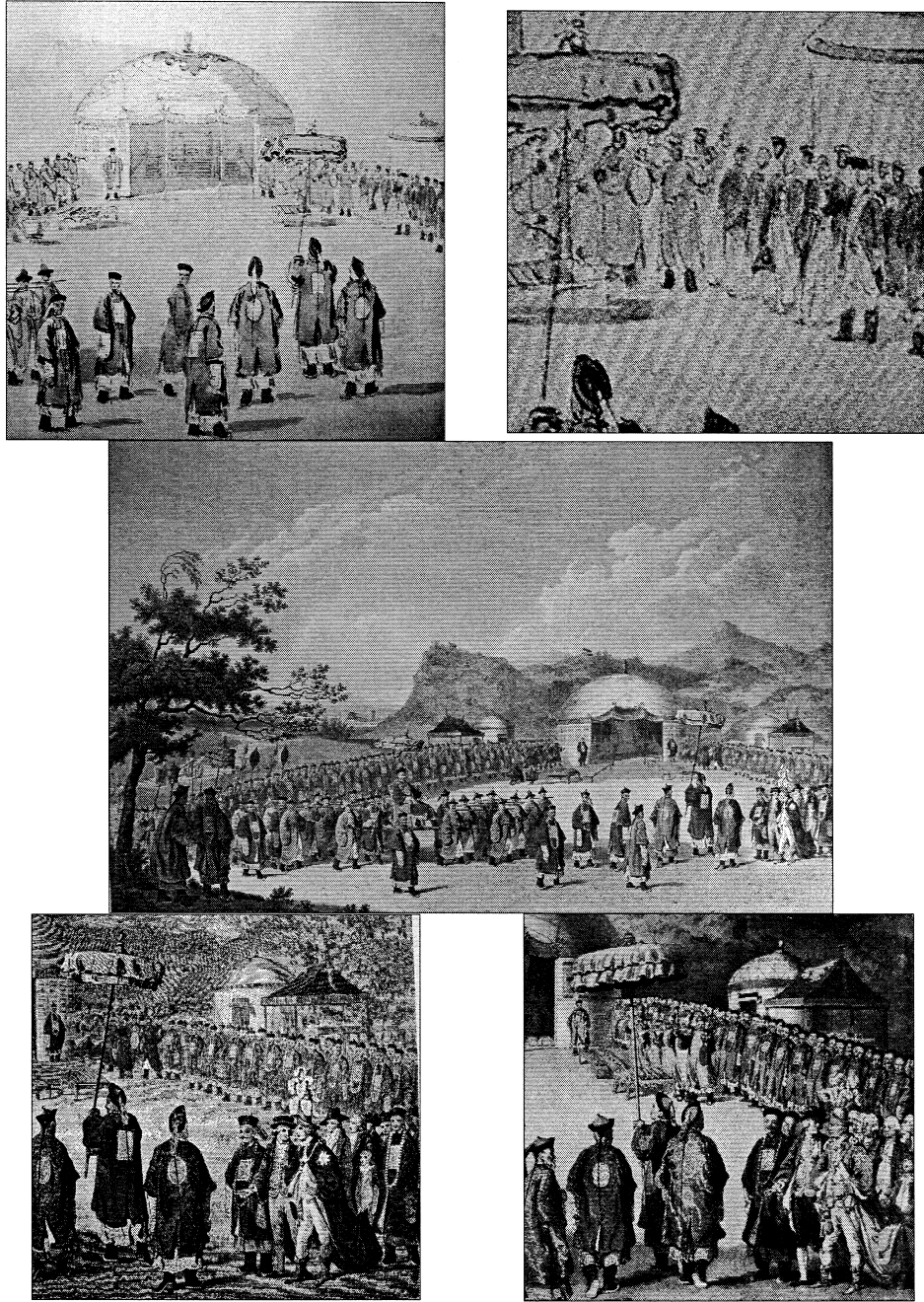
¹⁵² J. 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London: The Folio Society, 2004), p. 68; Jean-François Jarrige, et al., *Visiteurs de l'Empire céleste* (Paris: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1994), p. 177. 前一由 The Folio Society 重印之本，較一九六二年之初版刪略了部分文字內容，但亦增添了大量圖像。

¹⁵³ 此見 Jarrige, *Visiteurs de l'Empire céleste*, p. 147.

¹⁵⁴ 此圖乃掛於承德避暑山莊的卷阿勝境殿，似不曾出版，故額勒桑德應無機會過眼。參見聶崇正，《清代宮廷繪畫》（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頁116-118, 253-254。

¹⁵⁵ Legouix, "Lord Macartney's Audience with the Emperor of China."

¹⁵⁶ 前述有關服制的規定，請參見托津等纂，《欽定大清會典圖（嘉慶朝）》（據清嘉慶二十三年刊本景印，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卷四一，頁14；卷四六，頁4-5, 12-16。



圖三：額勒桑德繪刻，乾隆皇帝進入萬樹園之御幄接見英使前的景象。上左圖原為水彩畫，現藏大英圖書館，上右圖則是其局部放大。中圖出自 W. Bulmer & Co. (1797) 刊本，下左圖為其局部放大。下右圖為大英博物館所藏水彩畫之局部放大。

額勒桑德亦繪有一幅馬戛爾尼在御幄內呈遞國書之圖（圖四），¹⁵⁷ 共畫出十二名使團人員，且一一註記其位置和名字。除了三名護衛隊的軍官、音荅斯當（*Hindustan*）號的船長、譯員以及隨團醫生之外，另有三人是與正使馬戛爾尼和副使斯當東私人關係密切的親隨；此外，英國東印度公司主席百靈（Francis Baring, 1740-1810）的第三子白齡（Henry Baring, 1776-1848）亦廁身其間，他被安插為助理秘書（assistant secretary）。¹⁵⁸ 至於圖上之中外人士，幾乎全是隨興站立在四周，圖左有兩名中國官員甚至還在相互交談，馬戛爾尼則正向端坐在寶座上的乾隆皇帝單膝下跪，敬呈以雙手捧著的一個扁盒。

此外，額勒桑德還繪有一幅小斯當東獲皇帝親賜其隨身荷包之圖（圖五），此事應發生在馬戛爾尼呈遞國書之後數分鐘，故兩張畫的構圖幾乎如出一轍，尤其，在皇帝身後的官員連姿勢都雷同，倒是旁觀的使團中人僅見馬戛爾尼、斯當東和李自標三人，餘人則被替代成較不需要注意臉部細節的中國官員。至於背景，則較圖四增加了一些儀仗以及抬轎之人（可從其所戴之尖帽辨別），這些人或物在真實的狀況下，應不會被允許進入御幄！額勒桑德在繪製此圖之前，還畫了一張小斯當東單膝下跪，並以單手接受御賜荷包的鉛筆草圖。¹⁵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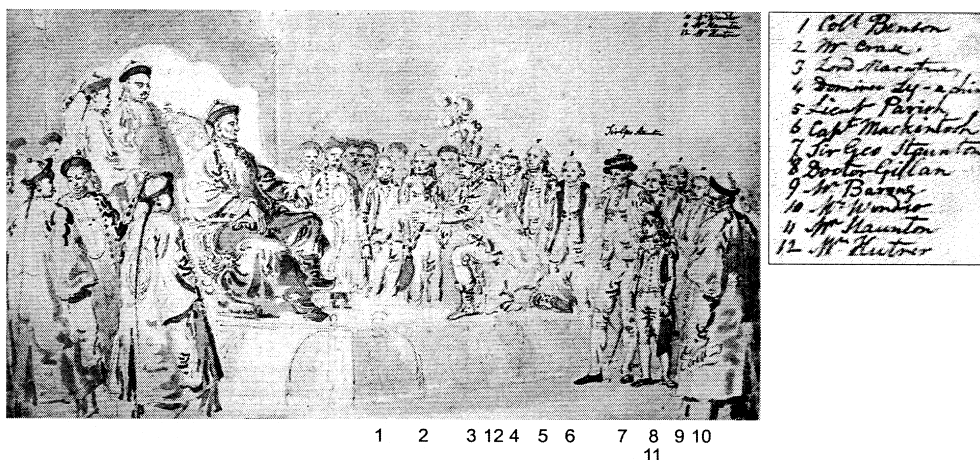
未能至熱河親睹此一歷史場景的額勒桑德，主要是根據參與觀見之副總兵官吧爾施（Henry William Parish, ?-1798）所畫的兩張現場草圖（圖六，頁75），以及其他當事人的口述來進行創作。¹⁶⁰ 爲了增添真實感，他還做了許多預備功課，單獨素描或細繪過畫中的主要元素，如皇帝乘坐之十六人步輿、抬轎者、御賜荷包、著相同服飾的使團成員、中國官員等。

¹⁵⁷ 此圖現藏大英圖書館，編號為 WD 961/f.57(154)，轉引自 Cranmer-Byng, *An Embassy to China* (2004), p. 69.

¹⁵⁸ 先前有將 M^r Baring 誤釋成 M^r Barrow 者。參見 Singer, *The Lion and the Dragon*, plate 12; Anderson, *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p. 120; <http://worldstatesmen.org/India.htm>; <http://www.danbyrnes.com.au/blackheath/thebc38.htm>.

¹⁵⁹ 參見 Jarrige, *Visiteurs de l'Empire céleste*, p. 151.

¹⁶⁰ 據 Legoux 的臆測，額勒桑德可能還參考了 Jaques-Philippe Le Bas 於一七七〇年在巴黎所刻之一幅〈得勝圖〉銅版畫，該圖或源出在華耶穌會修士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的畫作，共刷印兩百張，幾乎全數運返中國，但一七八五年又以較小之版本在歐洲刊行。參見 Legoux, "Lord Macartney's Audience with the Emperor of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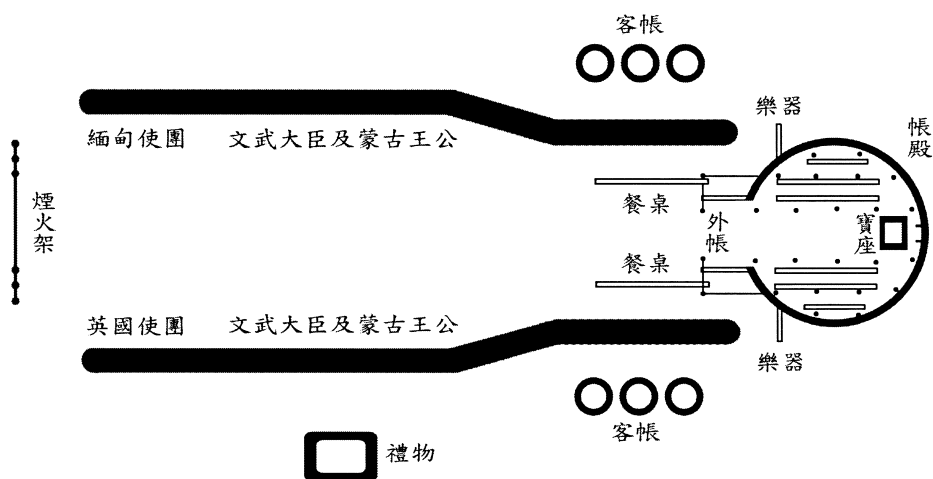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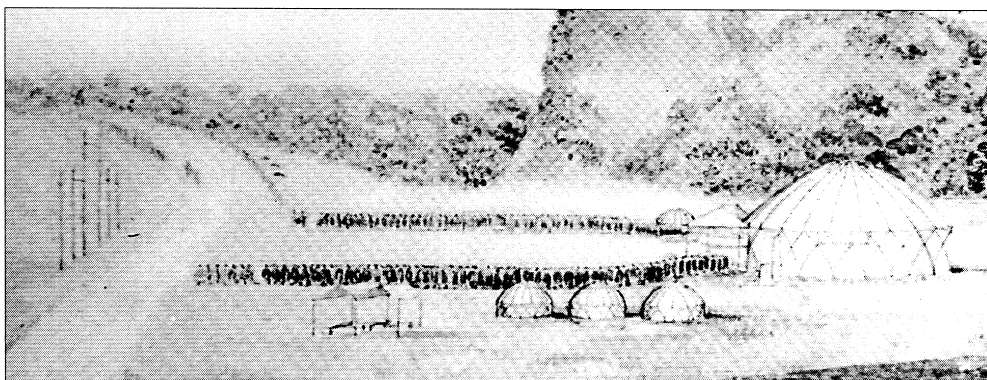


圖四：額勒桑德所繪馬戛爾尼呈遞國書之圖，大英圖書館藏。現將圖右上角的文字說明放大於右，並於圖下加註編號，以資判別。



圖五：額勒桑德所繪小斯當東獲乾隆皇帝親賜荷包之圖。¹⁶¹

¹⁶¹ 此圖原為水彩畫，現藏美國 Huntington 圖書館，轉引自 Peyrefitte, *The Immobile Empire*, p. 283；又，該御賜荷包之詳圖，另可見於 Singer, *The Lion and the Dragon*, plate 14.



圖六：吧爾施所畫乾隆皇帝在萬樹園接見英使之兩張位置草圖。上圖為私人收藏，在此僅擷取其局部，以與下圖（改繪自大英圖書館所藏之俯視圖）相對照。¹⁶²

¹⁶² 轉引自 Legoux, "Lord Macartney's Audience with the Emperor of China." 筆者曾於二〇〇六年九月親赴承德避暑山莊中的萬樹園調查，大致可以對照出吧爾施所畫草圖上的物件與方位：帳殿現已重修成一大蒙古包餐廳，帳前仍存有一對鏽跡斑斑的煙火架，惟西側的岡巒應與帳殿還有段距離，巒頂上建有知名的南山積雪亭。

查吧爾施圖上的所有中外官員，均整齊排列在幄前兩側，王公貴族們在近處，英國使團（十二人）在東翼最遠端，緬甸使臣（三人）則被安排在西翼最遠端。吧爾施也仔細畫出御幄（直徑約二十一公尺）內外的佈置：大幄旁有專供等候謁見之人休息的圓形客帳以及擺置御賜禮物的長帳；大幄入口處設外帳，兩旁為樂師和樂器之所在。¹⁶³ 入幄後直到底有一墊高的平臺，上置一張坐北朝南的寶座，寶座的左右兩邊各排列三張平行的餐桌。外帳及其外兩側亦各設長桌，供筵宴之用。

額勒桑德所畫的幾幅在大幄外恭迎皇帝之圖（圖三，頁72），其中英國使團所在位置彼此略有不同，但均與吧爾施所示有差。額勒桑德想必是為了凸顯使團中人（此應為歷史繪畫的特色），而將其位置挪近至圖的正前方右側。又，在郎世寧的〈萬樹園賜宴圖〉上，道旁的大臣們均是跪迎鑾輿，額勒桑德也或為了維護使團的尊嚴，把原本跪迎鑾輿的眾人，逕自全改畫成站立姿勢！

此外，依照前述所引各在場之使團中人的描述，該謁見典禮的進行是十分講究尊卑規矩和位次安排的，讓人感到宗教般的敬畏肅穆氣氛，亦即，當時觀禮的王公大臣和外藩使節，都應如吧爾施的圖示，是各就其位。¹⁶⁴ 和珅以及另兩位內臣，且一直都跪在皇帝身邊答話；¹⁶⁵ 至於其他使團成員以及較低階的中國官員，則站在大幄入口處。因知，姑且不論馬戛爾尼行禮的姿勢為何，額勒桑德或為方便呈現使團中人在此一歷史時刻的參與，遂在圖四（頁74）中將原本站在入口處的本生中校等八人，均改繪成在馬戛爾尼身旁參差圍觀。至於小斯當東在接受御賜荷包時，依其自述，其父應一同在臺上，但額勒桑德或亦為了在圖五（頁74）中凸顯主角，也只在臺上畫了小斯當東。

經前文的詳細考證，我們可以發現史實與這些圖像之間的關係，頗近乎史書之於歷史小說。額勒桑德在返英之後，一直與馬戛爾尼和斯當東關係密切，¹⁶⁶ 故我們可發現他常會擷取對使團較具正面意義的歷史片斷加以發揮，藉此宣揚「官方」立場。一七九九年，小斯當東赴華擔任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的書

¹⁶³ 類似佈置的具像，可參見前述郎世寧等所繪之〈萬樹園賜宴圖〉(1755)。

¹⁶⁴ 以在萬樹園帳殿中舉行筵宴為例，此類場合對各人所在位次均有嚴格規定；參見《欽定大清會典圖（嘉慶朝）》卷二一，頁7-8。

¹⁶⁵ 參見 G. L.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2:76, 79.

¹⁶⁶ 此故，只有在斯當東的「官方」報告中，才可見到由額勒桑德所提供的大量精采畫作。而在 Anderson 等人的出版物中，則均未獲額勒桑德的配合或授權。

記（writer；中國人稱為「寫字」，負責抄寫相關的貿易文件）時，或亦曾商請額勒桑德畫了一幅英使在萬樹園御幄之前迎接乾隆皇帝鑾輿的水彩畫，以為紀念或展示自己的特別經歷之用。¹⁶⁷ 惟因額勒桑德無緣身歷一些重要場合，故他的作品雖貌似寫實，卻帶有許多創作的成分，並蓄意凸顯馬戛爾尼等人所希望大家接受的歷史表象。由於先前我們對觀禮之爭的瞭解尚不夠深入，故這些充塞異國風情的動人畫作，雖然其內容已遭刻意扭曲，仍促使近兩個世紀以來的許多西方人士相信，英使並不曾在乾隆皇帝面前雙膝下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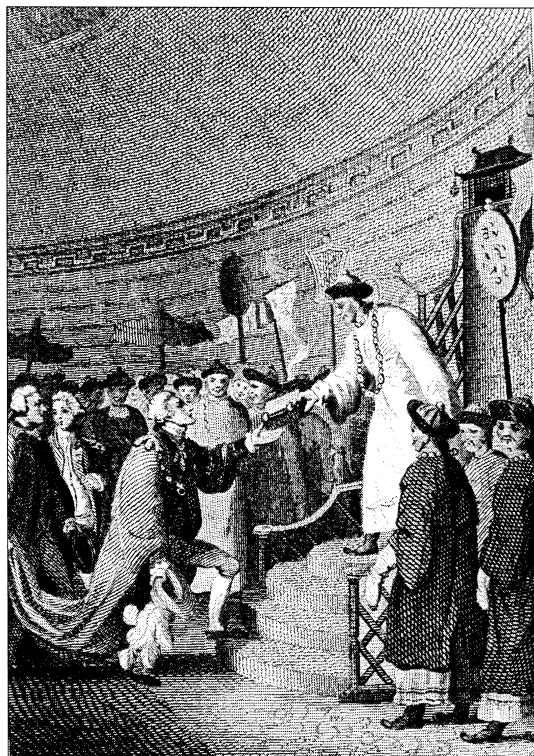
在筆者自藏的《馬戛爾尼勳爵使華之準確報告》（*An Accurate Account of Lord Macartney's Embassy to China*）一書中，¹⁶⁸ 前有一幅一七九八年一月由 Corbould 所繪之圖（圖七），¹⁶⁹ 描寫乾隆帝在御幄之內接見英使的景象，圖中僅見三名著西式服裝之人（應即馬戛爾尼、斯當東和李自標），至於替正使牽衣擺的小斯當東，則或因出了圖的左界而未畫出。馬戛爾尼在此圖中右手持帽，左手單手將內呈國書的盒子親交給原坐在臺上的乾隆皇帝，馬戛爾尼不僅未跪任一膝（其左腳乃前踏在階梯之上），乾隆帝還起身以右手接拿。此書的編者並未具名，僅自稱是使團中人，其內容乃摘抄自先前洛陽紙貴的 Anderson 之書，但書中三幅附圖的一些細節多屬想像，¹⁷⁰ 此或因受託繪圖之人不曾出使，且亦不曾掌握原始材料所致。

¹⁶⁷ 此畫在一八五六年由小斯當東捐給倫敦的皇家亞洲學會（Royal Asiatic Society），對照圖三（頁72）下方的另兩張相近之圖，發現此畫中的斯當東不再面向馬戛爾尼（呈現兩人的主從關係），而是一同向前注視乾隆皇帝。參見 Legoux, "Lord Macartney's Audience with the Emperor of China."

¹⁶⁸ 此為 Vernor & Hood 在 London 刊行之本，前有一七九五年匿名編者的自序和一七九七年的出版資料，惟因書首有一七九八年之圖，知此書在短短數年間曾再版多次。

¹⁶⁹ 此或指的是英國插畫家 Richard Corbould (1757-1831)，參見 <http://myweb.tiscali.co.uk/speel/paint/corbould.htm>.

¹⁷⁰ 如中國人在觀見尊者時並不脫帽，嘉慶帝且稱「免冠乃有過者之禮」，但此圖則依循歐人之習慣，繪馬戛爾尼右手持帽狀；參見《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5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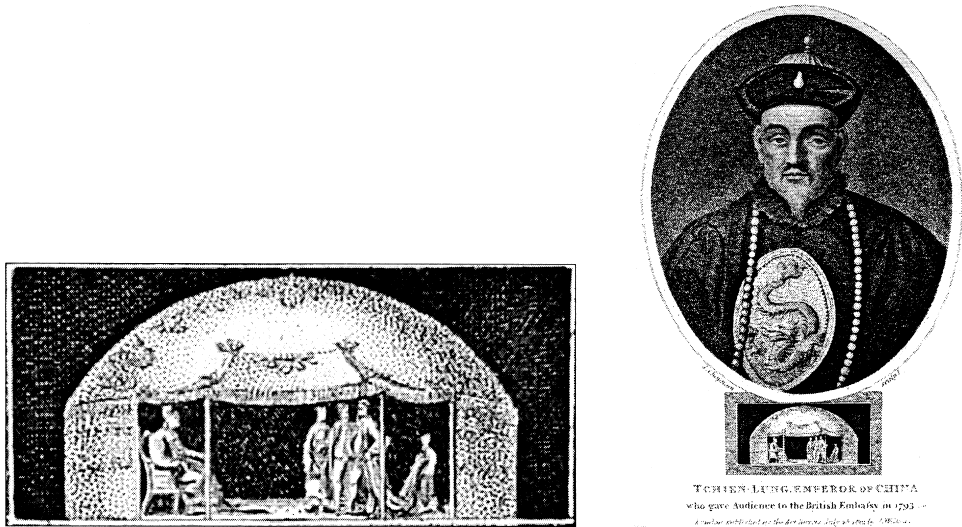
圖七：乾隆皇帝起立接受馬戛爾尼國書之圖，
此由 Corbould 於一七九八年所繪。

筆者還從 eBay 網站的拍賣中購得一幅一八〇一年由 John Wilkes (1750-1810) 出版的乾隆皇帝點刻 (stipple engraving) 肖像 (圖八)，¹⁷¹ 此畫的功力與寫實性均明顯無法與額勒桑德相提並論。在肖像的正下方附有一幅英使覲見圖：乾隆帝端坐在寶座上，三名使團之大人 (應即馬戛爾尼、斯當東和李自標) 則站立在前，另有一名小孩 (應即小斯當東) 牽著其中一人的衣擺。然而，圖中不僅無人下跪，且寶座與地面同高，繪圖者或藉以呈現雙方的平等地位。¹⁷² 隨著中國的形象日益低落，在十九世紀中葉歐洲的相關出版物中，更有將原先乾隆皇帝單手接國書的記載改成是雙手者！¹⁷³

¹⁷¹ 此圖亦收入 *The Britannic Magazine* 所發表的 “Sketch of the Reign of Tchien-Lung” 一文。

¹⁷² 此說出自 Hevia 在其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英文版書首插圖的說明；當然，也有可能因該圖原本就十分簡略，故未照顧到此類細節。

¹⁷³ 參見 *A Complete View of the Chinese Empire . . . a Dissertation on Its Antiquity, and a Genuine*



圖八：乾隆帝肖像及英使觀見圖（1801）。

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知名的漫畫家 James Gillray (1756-1815)，亦曾繪有一幅馬戛爾尼觀見乾隆皇帝的諷刺畫（圖九左），此一手工著色的版刻，是由 Hannah Humphrey 於一七九二年九月十四日刊行，紐約公共圖書館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以及倫敦國立肖像美術館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等單位現均仍藏有。¹⁷⁴ 由於使團在該月的二十六日才從樸次茅斯 (Portsmouth) 港出發，知此圖純屬想像。漫畫中的馬戛爾尼沒戴帽子，單膝下跪，並以單手呈遞國書，他身旁站著幾位拿著禮物的使團人員，其餘英人則雙膝跪地。原本身材瘦削的乾隆皇帝，竟被畫成體態臃腫的大胖子；其實，當時歐洲應有機會見到由在華傳教士所畫的乾隆帝肖像，如在馬戛爾尼來華時所搭的船隻上即掛有乙幅。¹⁷⁵ 前述帶有嘲諷意味的乾隆像，與鴉片戰後被西方人想像成腦滿腸肥的林

and Copious Account of Earl Macartney's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London: J. S. Pratt, 1842), p. 244. 查此處內容是直接摘錄自 G. L. Staunton 之報告，僅將單手改成雙手！

¹⁷⁴ <http://www.nypl.org/research/chss/spe/art/print/exhibits/gillray/part8.html>; <http://www.npg.org.uk/live/search/portrait.asp?LinkID=mp02854&rNo=3&role=sit>.

¹⁷⁵ 《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367-368。

則徐肖像，¹⁷⁶ 均遭到嚴重扭曲或醜化，多少流露出近代西方人對中國人的偏見或鄙視。



圖九：乾隆皇帝接受馬戛爾尼國書之漫畫（左圖）
以及想像之林則徐油畫（右圖）。

一八一六年，當英國攝政王子決定派阿美士德使華時，George Cruikshank (1792-1878) 也畫了一幅漫畫，名為“Court at Brighton à la Chinese”（圖一〇，頁82），¹⁷⁷ 此與圖九中由 Gillray 所繪的馬戛爾尼覬見乾隆皇帝一畫，風格頗近，主旨是在諷刺當時英國宮廷中流行的中國風 (*chinoiserie*)；¹⁷⁸ 因從一八一五年起，攝政王子就在 Brighton 的皇家行宮 (Royal Pavilion)，擺設許多以竹子、尖塔和龍等形貌為基調的裝飾品，並大膽採用紅、黃與金色等中國人喜愛的色調。

¹⁷⁶ G. H. R. Tillotson, *Fan Kwae Pictures: Paintings and Drawings by George Chinnery and Other Artist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ondon: Spink & Son Ltd., 1987), p. 94.

¹⁷⁷ Anna Jackson & Amin Jaffer, eds., *Encounters: The Meeting of Asia and Europe, 1500-1800* (London: V & A Publications, 2004), p. 357.

¹⁷⁸ Dawn Jacobson, *Chinoiserie* (London: Phaidon Press Ltd., 1993), pp. 192-198.

該漫畫中各人戴的笠狀帽、嘴角蓄的長八字鬚、帶著羽翼的龍以及吊燈的尖塔外型，均屬當時英國人認定的中國特有風格。而向攝政王子辭行的阿美士德及其兩名隨員（圖一〇右），更身著想像的中國服飾，其中阿美士德的帽子上還誇張地插有英國國旗。在圖右下方的大箱子內外擺置許多準備贈送中國皇帝的禮物，大多不太貴重，其中又以書籍居多；情色文學大家 John Cleland (1709-1789) 的 *Fanny Hill: Memoirs of a Woman of Pleasure* 亦赫然出現其間，該書共兩冊，一七四八至四九年出版，¹⁷⁹ 內容主要是披露一名女子風流浪蕩的生涯，書中露骨地描述性愛過程，因而在歐洲是洛陽紙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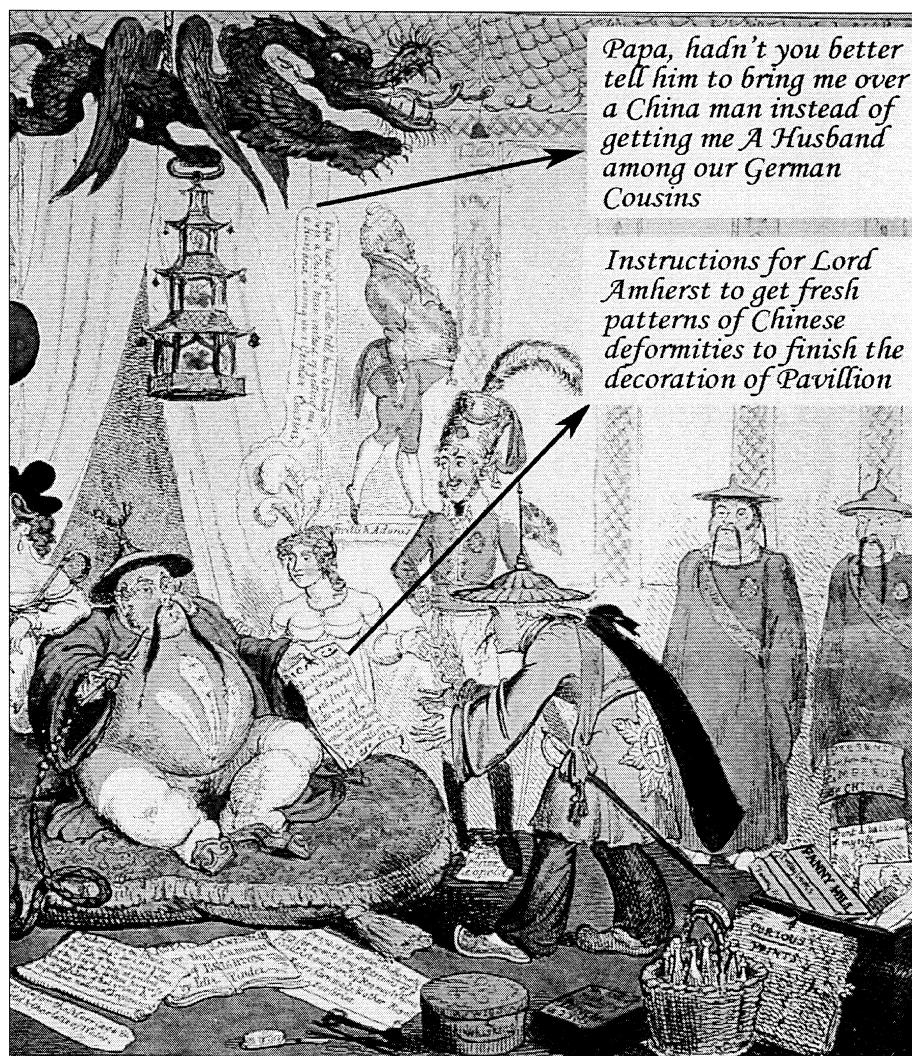
在此漫畫中，攝政王子正交給阿美士德一紙訓令，其上的文字是要他從中國帶回一些奇珍異物，以使用來完成 Brighton 行宮的裝潢工作。攝政王子的年輕女兒則站在他的左手邊，根據她頭上方的說明文字，她請求其父命阿美士德帶一名中國男子回來，因她不願嫁給其德國表親。在該公主的右上方畫了一位挺著肚子的男士，說明文字稱之為「英國美男子」(British Adonis)。此圖雖充塞嘲諷的內容，但我們仍可多少體會大英帝國的統治者對打通對華貿易管道的憧憬，阿美士德就是在此一籠罩著「中國風」的時代氛圍下來華的。

透過英使覬見清帝的儀禮之爭，西方著述也不斷凸顯中國將皇帝神祕化的情形。如在阿美士德使團醫生亞比利的紀行當中，即以圖文並茂的方式仔細描述代表皇帝之香案（圖一一左，頁83），¹⁸⁰ 此因英人很難理解清朝官員竟然對之行最尊貴的三跪九叩禮。此外，在筆者自藏的 *Scenes in China* (1819) 一書中，除多處敘述阿美士德使團的觀禮之爭外，書首插圖亦以香案來吸引讀者（圖一一右），用中國人向其行三跪九叩的「荒謬」舉動，來對比在場西人所行的鞠躬禮；¹⁸¹ 該書所刊刻的圖像較粗糙，應屬想像畫（如屏風上的怪獸就不屬中國常見的圖騰），但作者或亦希望能藉此圖以強化英使在遙遠東方之異國所受的無理對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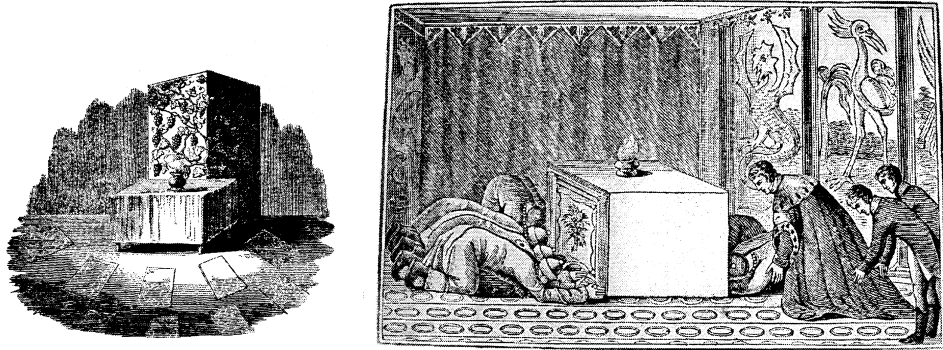
¹⁷⁹ 此書之電子本可見於 <http://etext.library.adelaide.edu.au/c/cleland/john/c624f/index.html>.

¹⁸⁰ Abe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pp. 80-81.

¹⁸¹ 此見 *Scenes in China, Exhibiting the Manners, Customs, Diversions, and Singular Peculiarities of the Chinese . . . Including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iculars in Lord Amherst's Recent Embassy* (New York: Samuel Wood, 1819)，筆者另藏有 E. Wallis 約一八二〇年在倫敦刊行之本。



圖一〇：George Cruikshank 所繪，英國攝政王子接見即將使華之阿美士德的諷刺漫畫（局部圖）。筆者將畫中兩段重要話語重新放大膽寫在右上角。



圖一一：代表皇帝之香案（左）以及中、英官員對之行禮的情形（右）。

透過前述各種圖文互補的相乘效果，近代許多西方的漢學家或出版者即不斷灌輸閱讀者一種歷史認知：馬戛爾尼和阿美士德等人成功地維護了英國的尊嚴，而中、西方的外交很難透過平和、友善的協商來達成，故最後只能訴諸砲彈來解決紛爭。¹⁸² 鴉片戰爭之後，馬戛爾尼等事件所形塑出的「歷史印象」，即被列強拿來合理化其侵華的行徑。

五・結論與餘論

吸引筆者投身中英觀禮之爭課題的最主要因素，是發現在馬戛爾尼和阿美士德使華此兩多采多姿的外交事件當中，竟仍存世立場各異的眾多原始文本以及豐富的圖像資料。惟當面對何偉亞《懷柔遠人》一書在漢學界所激起的「現代史學」與「後現代史學」路線之爭時，本文則選擇先回歸源頭，嘗試還原此兩次觀禮之爭的真貌，並探究中英雙方敘事出現重大落差的主因。

雖然歲月沉澱後的史料往往是片面不全的，且越是關鍵性的當事人，其對史

¹⁸² 如見 Jacob Abbott, *China and the English: or the Character and Manners of the Chinese* (New York: Leavitt, Lord, & Co., 1835), pp. 134-232; Julia Corner, *China: Pictorial, Descriptive and Historical with Some Account of Ava and the Burmese, Siam and Anam* (London: Henry G. Bohn, 1853), pp. 144-158; Robert Sears, ed.,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a and India* (New York: Robert Sears, 1855), pp. 109-121.

事的描述就越不可能全然客觀，¹⁸³ 但筆者仍期盼可從不同面向去揣摩和探索該圖文之作者所看到或所希望呈現的歷史影像，以便盡力去還原史實。

查馬戛爾尼使團中只有十二名官紳曾在避暑山莊的萬樹園覲見乾隆皇帝，但他們對外都絕口不提當時所行之禮，即使在其日記或文稿中，亦常是點到而已，或只作選擇性的描述，甚至有人稍後還在手稿上刪改敏感字句；同樣地，在現存的大量清宮檔案中，竟然也對雙方在覲禮問題的談判過程留白，且對英使實際所行之禮的記載付諸闕如。然而，曾身歷其事的幾位中英人士（馬戛爾尼的貼身侍童小斯當東、使團秘書文帶、隨侍乾隆皇帝的軍機章京管世銘以及後來登基為嘉慶皇帝的顥琰），還是留下了許多蛛絲馬跡，讓我們仍有機會揭開此一引起近人矚目的世紀之謎。

由於使團中曾覲見乾隆皇帝的十二名官紳在回到熱河住所後，對外都絕口不提當時情形，以致連其他隨團之人均莫知究竟。此故，除了前述的 Anderson 外，另一位亦留下日誌的軍士 Samuel Holmes，對覲見過程也無一語描述。¹⁸⁴ 倘若馬戛爾尼等人確是如其所言以一次單膝下跪之禮呈遞國書，相信他應會驕傲地向眾人公開說明。同樣地，倘若馬戛爾尼同意行三跪九叩之禮，此亦應被清廷視為協商的重大勝利，官方文獻中也該特意著墨才對，不致於在現存的七百多件清宮檔案中竟然恰缺此一關鍵敘述！

根據前文的析探，當時雙方為避免談判破裂，遂協議將整個儀式分成迎接鑾輿、覲見皇帝和呈遞國書三個主要部分，並各自做出讓步：當皇帝的鑾輿經過在御幄外等候的使團時，英人依中國的常規行了禮（他們至少承認曾依照眾人九叩首的節奏單膝跪地行禮），雙方並短暫交談；入幄之後，英使先於寶座所在的平臺邊，行略加修改的中式入覲禮，雙膝下跪三次，每次三俯首深鞠躬，¹⁸⁵ 相較於原本的三跪九叩，此兩禮的動作和姿勢差異不大，¹⁸⁶ 如此，一方面保全了中

¹⁸³ 此與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海森堡 (Werner Heisenberg, 1901-1976) 所提出的「測不準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或有異曲同工之處。依照該原理，兩個互補的物理量（如一粒子的位置和動量）不能同時被準確測量，而對其中一個物理量的測量越準，由於實驗者在測量時所產生的干擾，將使另一個物理量變得更不易測準。

¹⁸⁴ Samuel Holmes, *The Journal of Mr. Samuel Holmes* (London: W. Bulmer & Co., 1798), p. 144.

¹⁸⁵ 考量入幄覲見皇帝之禮理應較在道旁恭迎鑾輿時更為隆重，再加上管世銘的詩作中亦稱英使「雙跽俯伏」，遂有此結論。

¹⁸⁶ 時人對此事的看法，主要取決於其如何看待兩禮之間的細微差異。此故，後來嘉慶皇帝在處理阿美士德使團事件時，既聲稱曾見馬戛爾尼三跪九叩，又語帶保留地稱：「凡事不可過於苛細，轉失馭外之禮，即五十八年亦係將就了此一事耳！」翌年抵華的朝鮮貢

國所要的面子，但又因不曾叩頭到地，故亦可與藩屬國使臣之觀禮相區隔，滿足英使所堅持的最起碼之尊嚴；¹⁸⁷緊接著，在呈遞國書時，則同意用英式禮節，馬戛爾尼單膝跪地，並一反貢使之常例，親手將國書交給皇帝，但免去對中國社會不太合宜的吻手禮。¹⁸⁸至於在其他場合（如迎接鑾輿、接受諭旨以及向代表皇帝的無人寶座或香案致敬等），則允許英使可行較觀見時稍次之禮：單膝下跪三次，每次三俯首深鞠躬；由於其節奏與三跪九叩禮同，亦不致在集體儀式中顯得突兀。¹⁸⁹

此一新的研究結果，與先前其他學者相關專論中的推判均不全同，也與坊間乾隆皇帝之傳記、通論式之清史、中外歷史教科書中的描述有異。¹⁹⁰尤其，還首度對存世之馬戛爾尼單膝跪地呈遞國書的歷史繪畫進行詳細辨證，具體證明其與史實的差距頗大。

查當年除英國之外，緬甸也派遣使臣來華賀壽。八月初十日，乾隆帝在萬樹園御幄接見英使時，緬甸使臣亦在場觀禮；十三日，兩國使臣也同在澹泊敬誠殿參與萬壽節的慶祝活動。¹⁹¹乾隆帝在敕諭緬甸國王的國書中，還語帶炫耀地特別提及英國也首次遠渡重洋來朝貢。¹⁹²前述中、英協商出的各種儀禮，應既可為英使勉強接受，又不至於讓清朝在屬國面前有失顏面。

使則聽聞英人「朝見之時，不知禮數」，有西洋傳教士亦認為妥協後之禮仍非中國慣用之禮，但俄羅斯通事 Vladykin 則稱英使最後還是三跪九叩了。參見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Diplomatic Missions to the Court of China: The Kotow Question II,"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4 (1897): 627-643; Pritchard, "Letters from Missionaries at Peking Relating to the Macartney Embassy," pp. 35-38; Proudfoot, *Biographical Memoir of James Dinwiddie*, p. 78; 《朝鮮正宗大王實錄》（漢城：探求堂，1984），卷三九，頁39-40。

¹⁸⁷ 參見劉家駒，〈英使馬戛爾尼觀見乾隆皇帝的禮儀問題〉，頁48。

¹⁸⁸ Cranmer-Byng, *An Embassy to China* (1962), p. 119.

¹⁸⁹ 由於此與中國的行禮方式差異不大，故文帶在記述使團於萬樹園迎接鑾輿時，以及小斯當東在記述使團於廣州向代表皇帝的香案致敬時，均自認為是依照中國的常規行了禮。

¹⁹⁰ 如見孫文良、張杰、鄭川水，〈乾隆帝〉（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428-429；周遠廉編，〈清朝通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乾隆朝分卷下，頁673-674；徐中約 (Immanuel C. Y. Hsü) 著，計秋楓、朱慶葆譯，〈中國近代史〉（*The Rise of Modern China*，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上冊，頁154-156；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著，溫洽溢譯，〈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1），頁135。

¹⁹¹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四三四，頁11, 17-18。

¹⁹²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承德市文物局編，〈清宮熱河檔案〉（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第7冊，頁301。

此外，清廷可能也同意馬戛爾尼在不對外公開的場合可行英式禮，故我們可發現在英使沿大運河赴廣州途中，欽差松筠於船上宣讀聖諭或轉送御賜禮物時，正、副使均只是「免冠屈膝」。¹⁹³ 又，馬戛爾尼於十月初九日至松筠舟中請他代向乾隆帝呈進稟紙時，亦只是「跪請大皇帝聖躬萬安」，¹⁹⁴ 此處或僅指單膝下跪，否則，松筠應會明記跪叩的情形。但對不具官方使節身分的英人而言，他們對儀禮就不那麼計較，此故，當自鎮海出洋的英國官兵獲賜杭綢和絲茶時，就都「免冠伏地，連次叩頭」。¹⁹⁵

由於清廷不希望此一對觀禮的讓步，將來被其他國家有樣學樣，而英使亦略感羞辱，不願被其國人知道，故兩造或同意不將協商的結果訴諸公開文字。此舉提供了後來雙方各自表述的空間：中方將焦點放在入覲禮，認為英使當時的確三跪九叩了，只不過因其「僻在荒夷」，故「不能中規合度……起跪之間稍覺生疏」（借用嘉慶皇帝語）。亦即，將其未能叩首一事，歸之於練習不夠嫻熟。此故，嘉慶皇帝始終理直氣壯地堅稱，他親見馬戛爾尼在其父皇面前三跪九叩。至於英國使團中的核心人物（如馬戛爾尼、斯當東和額勒桑德等），在正式出版或發表相關著述及畫作時，則蓄意略去令其尷尬的覲見禮，而凸顯馬戛爾尼在呈遞國書或小斯當東在接受御賜荷包時所行的單膝跪地禮，且在敘述其他行禮的場合時，常特意淡化次數，希望透過這些小動作使人產生錯覺，誤以為該使團曾成功維護了英國的尊嚴。¹⁹⁶

雖然，後世視馬戛爾尼來華時的覲禮衝突既緊張且激烈，但當時雙方對最後秘密協商出的結果，其實都還算能接受。以「十全武功」自詡的乾隆帝，對英使遠來賀壽一事相當在意，故他希望覲禮之爭可以得到體面的解決，因此他會將自己的做法與說辭明白諭示處理此事的官員，並命其：「當於無意閒談時婉詞告知」，馬戛爾尼在無法承受被拒絕接見的後果之下，終於同意略作妥協，雙方心領神會地共同把這齣《龍獅初會》的新戲給演完。

鑒於馬戛爾尼的配合，此故，乾隆皇帝在英使離華前夕，嘗透過新任兩廣總督長麟，表明歡迎英王派人參加他的禪位大典。¹⁹⁷ 斯當東亦於一七九五年六月

¹⁹³ 《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414, 443。

¹⁹⁴ 同前書，頁478。

¹⁹⁵ 同前書，頁485-487。

¹⁹⁶ 雖然馬戛爾尼總結其使華任務是一項外交勝利，但仍有一些英人對此不表同意。參見何偉亞，《懷柔遠人》，頁221。

¹⁹⁷ G. L.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2:251.

從倫敦寫信給曾協助改善英商在華貿易處境的長麟，¹⁹⁸ 強調唯有兩國合作才符合雙方最大利益，並聲稱自己有可能明年去廣州，且以正使身分祝賀乾隆皇帝的八十六歲誕辰；他在同年稍後寫給小斯當東的家書中，亦稱從中國來信聽聞乾隆帝已宣立皇十五子顥琰為皇太子，且將於明年正旦登基，這應是再度使華的最好時機；而在其致馬戛爾尼的信中，也稱應趁舊識長麟擔任兩廣總督時再遣使。¹⁹⁹ 惟因斯當東稍後突然癱瘓，遂於一八〇一年齋志以終。

對大清帝國而言，馬戛爾尼使團只是其兩百多年歷史中許許多多外交事件之一，船過水無痕，官方檔案雖然豐富，卻遭遺忘在故紙堆中。至於民間記述更是寥寥可數，如徐朝俊在嘉慶十二年初刊百科全書式的《高厚蒙求》時，其中〈海域大觀〉一章的前序，雖曾出現「（乾隆）五十八年，更有西北極遠之英吉利國及有西域遠部廓爾喀獻貢投誠」等字，²⁰⁰ 卻毫無相關細節；梁廷枏在《英吉利國記》（1845）中，雖有百餘字記乾隆朝來華英使之事，但其中連正使之名都被誤作馬戛爾（農按：此三字原文皆有口字旁）！²⁰¹

即使民初在修《清史稿》時，書中對乾隆朝英使來華事件的簡單描述，亦出現基本錯誤，如其文有云：

乾隆季葉，英使馬格里入覲，禮臣與議儀式，彼以覲見英王為言，特旨允用西禮。筵宴日，且親賜卮酒。商約既締，將命頻繁。²⁰²

所提及的馬格里 (Halliday Macartney, 1833-1906)，其實另有其人，他與乾隆朝來華的馬戛爾尼為同姓之親戚，曾在李鴻章手下負責金陵機器局，後被任命為大清駐英公使參贊兼翻譯。²⁰³ 事實上，筆者相當懷疑當時清史館中之工作人員，有機會參考相關的大量中外原始文獻，並據以推斷乾隆帝特旨允許馬戛爾尼行用西禮！

¹⁹⁸ 朱雍，《不願打開的中國大門》，頁258-269。

¹⁹⁹ 此段參見 George Thomas Staunton, *Memoir of the Life and Family of Sir G. L. Staunton* (Havant: private circulation, 1823), pp. 356-365.

²⁰⁰ 徐朝俊，《高厚蒙求》（清嘉慶間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海域大觀〉，頁28-29。小斯當東曾購藏此書，其中文藏書現歸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SOAS) 圖書館，參見 <http://uk.geocities.com/Morrison1782/Other/Staunton.html>。

²⁰¹ 梁廷枏，《英吉利國記》（據清道光二十五年序刊本景印，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8〕），頁20-21。

²⁰² 《清史稿》卷九一，頁2679。

²⁰³ 參見黃一農，〈龍與獅對望的世界〉。

一八一六年，阿美士德奉派使華，希望能為野心勃勃的大英帝國爭取更多政商權益，先前馬戛爾尼的覲禮之爭，不可避免地又被從記憶深處搬上檯面。尤其，身歷其事的顥琰已貴為皇帝，而馬戛爾尼的貼身侍童小斯當東也克承父志，成為阿美士德的副使；²⁰⁴ 嘉慶帝對馬戛爾尼的「不知禮數」或仍深懷不滿，小斯當東則一直無法忘懷所受的「屈辱」，兩造遂將馬戛爾尼先前所行之覲禮當成談判的籌碼，並各自扭曲事實，於是中方為了不致「有損國體」，英方為了維護帝國尊嚴，使得協商瀕臨破局。

嘉慶皇帝明知馬戛爾尼並未行完整的叩頭禮，卻從一開始就對阿美士德施壓，或許因他希望此事能比照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入覲的荷蘭使團，其正使德勝(Isaac Titsingh, 1745-1812) 抵京之後，乃於鑾輿經過時呈遞國書，當時是由隨侍的大臣接過後再轉交皇帝，德勝並行了道地的三跪九叩禮（“bowing the head three times to the ground three times over”），且在許多場合均跪叩如儀。²⁰⁵

阿美士德最後原本願屈從行跪叩禮，但小斯當東堅決反對，而他讓步的極限是行跪一膝、三俯首之禮共三次，此在形式上應不若馬戛爾尼所行雙膝跪地之三跪九拜禮尊崇，因疑小斯當東當時並不會將馬戛爾尼覲禮真相的祕密向阿美士德坦白，否則，阿美士德應不至於會考慮直接退讓至清朝所要求的底線。

根據現存大量中、英兩造所留下的文獻，嘉慶帝似乎有意將其與阿美士德的初次見面定位成非正式的，並視英使所行之禮的輕重，判斷是否安排另一公開場合以接受國書，故他或有意地臨時提前一天召見。雖然和世泰當時曾告知英使可行他們所願行之禮，但因雙方的互信基礎薄弱，且嘉慶帝始終不願掀開底牌，忐忑不安且感覺極端不受尊重的阿美士德，遂在進殿前一刻決定拒絕入覲，令此一外交任務以失敗告終。

對民族主義日盛且國勢日強的大英帝國而言，清廷強迫馬戛爾尼和阿美士德行三跪九叩禮的屈辱，經由兩使團回國後所刊行各種圖文的有效傳播，一直令英

²⁰⁴ 小斯當東之父早就立意培養他成為未來使華之使節，參見 Lydia Luella Spivey,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Agent for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in China 1798-1817” (master’s thesis, Duke University, 1968), pp. 5-6.

²⁰⁵ André Everard van Braam,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Embassy of the Dutch East-India Company, to the Court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in the Years 1794 and 1795* (London: R. Phillips, 1798), 1:189-190, 221-223. 此書稱荷使曾與年約三十歲的皇十七子談話，並註稱此子於稍後登基；然因即位的顥琰乃皇十五子（時年三十五歲），十七子顥璘則為二十九歲，不知荷使究竟所見何人？

國人耿耿於懷。²⁰⁶ 有些書中於是藉馬戛爾尼之口嘲諷一七九五年來華的荷蘭使團，稱其正使德勝雖向乾隆皇帝行了三跪九叩禮，卻遭觀禮的中國人恥笑，且事後毫無所得。並不實地引述其副使范罷覽 (André Everard van Braam Houckgeest, 1739-1801) 之語，指稱乾隆帝曾將御筵上的一道菜賞賜荷使，但「其上的羊腿肉幾乎已被啃淨，且置於骯髒的餐盤中，原本或準備拿來餵狗，理不應做為人類的餐食」！²⁰⁷ 十九世紀西方的反華情緒，即不斷受到此類煽情話語的挑撥，且常可追溯至中外的觀禮之爭。

從一七九三年馬戛爾尼使華至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簽訂的半個世紀間，小斯當東或是對這段中英交涉史見證最多的人物。²⁰⁸ 當他十二歲時，即以馬戛爾尼貼身侍童的身分來華；十九歲時，或因其優越的中文能力和父親的關說，而獲聘為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書記；一八一六年，且陞任為特別委員會之主席 (Presiden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並被聘為阿美士德使團的副使；出使任務失敗後，他被疑為居間作梗者，而遭清廷驅逐出境，於是回英從政，長期擔任國會議員，並成為廣受眾人認同的中國通。²⁰⁹

阿美士德使團的不愉快記憶，亦曾透過其成員在稍後的律勞卑事件中發酵。一八三三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喪失其對華貿易的壟斷權，英國政府旋即任命律勞卑為駐華商務總監督 (Superintendent for Trade with China)，直屬外交部；並以德庇時 (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 為第二監督，此人曾以迪惠氏之名擔任阿美士德使團的譯生；²¹⁰ 義律 (Charles Elliott, 1801-1875) 為船務總管；阿美士德

²⁰⁶ Zhang, "British Views on China during the Time of the Embassies of Lord Macartney and Lord Amherst (1790-1820)," pp. 259-263.

²⁰⁷ 此引文實應出自德勝的日記，惟或有過分渲染之嫌；因查范罷覽之報告，多處指出皇帝屢在餐宴中賜食，他不僅稱獲賜之食物精美，並認為此乃極大榮耀。參見 John Francis Davis, *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36), 1:96-97; van Braam,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Embassy of the Dutch East-India Company*, 1:191-193, 224-225, 271-272; C. R. Boxer, "Isaac Titsingh's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Ch'ien Lung (1794-1795)," *T'ien Hsia* 8.1 (1939): 9-33.

²⁰⁸ 下文中有關這半個世紀間的中英交涉史，可參見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上冊，頁153-191。

²⁰⁹ 參見 Spivey,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游博清，《小斯當東：19世紀的英國茶商、使者與中國通》（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²¹⁰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3:259；《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第5冊，頁53。

使團的另一名譯生瑪禮遜，則受聘為律勞卑的中文秘書兼通事。²¹¹

英國外相巴麥尊（Lord Palmerston, 1784-1865；原名為 Henry John Temple）當時訓令律勞卑要增開口岸，並與中國官員直接往來（先前均須透過行商）。律勞卑於是違反慣例，不經清政府同意，即將船直駛廣州。兩廣總督盧坤遂指派廣州知府等官員前往其住所，探詢其真實身分和來華目的；雙方卻因席位座次的安排無法得到共識，不歡而散。盧坤乃停止中英貿易，加以抵制；律勞卑則令兩艘兵船強行駛入珠江，並轟擊虎門砲臺。後因外有清軍的封鎖包圍，內有英國商人的反對，律勞卑被迫於一八三四年九月轉往澳門，雖在次月病死，卻已埋下日後雙方大規模武力衝突的種子。²¹²

一八四〇年二月二十日，巴麥尊未徵得國會同意，即逕行向印度總督下達對華開戰的命令。四月七日，英國下議院開會討論是否支持對中國用兵，當時正反兩派的力量旗鼓相當；六十歲的小斯當東於是發表了一場對中國近代史影響深遠的主戰演說。他雖不贊成以鴉片傾銷中國，但認為中英衝突的癥結，應是清朝漠視與違反國際法，對走私鴉片之英人處以過於嚴苛的死刑；他主張英國政府的立場絕不能退縮，且有必要以武力做後盾。他並驕傲地提及自己在阿美士德使團時所做的堅持。²¹³

下議院隨即以二百七十一票比二百六十二票的些微差距通過法案，追認對中國的宣戰。²¹⁴ 在小斯當東的自傳裡，他自稱其演說對國會的決議發揮重要影響力；而在之前曾多次與小斯當東就中國問題對談的巴麥尊，亦於次日親筆函謝，讚許該演說「對議院起了極大作用」（made a great impression on the House）。²¹⁵ 馬戛爾尼和阿美士德兩使團的不愉快經驗，因小斯當東而與鴉片戰爭連在一塊；接著，或許還透過戰爭前期擔任英國在華全權代表的義律，以及一八四四至四八年間擔任香港第二任總督的德庇時，往下繼續延伸。

²¹¹ W. J. Townsend, *Robert Morrison: Pioneer of Missions to China* (London: Pickering & Inglis, 1928), pp. 172-173.

²¹² 此段參見王開豐，《隔膜、衝突與趨同》，頁171-181。

²¹³ George Thomas Staunton, *Corrected Report of the Speech of Sir George Staunton, on Sir James Graham's Motion on the China Trade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April 7, 1840* (London: Simpkin, Marshall, & Co., 1840), pp. 10-19.

²¹⁴ Jack Beeching, *The Chinese Opium Wars* (San Diego: Harvest/HBJ Book, 1975), p. 111.

²¹⁵ George Thomas Staunton, *Memoirs of the Chief Incidents of the Public Life of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Bart.* (London: private circulation, 1856), pp. 86-91.

本文嘗試追索馬戛爾尼使華之時，雙方當事人是如何表述其中敏感的觀禮問題，後世又如何認知該事件，並努力重塑這段歷史的原貌。然而，真相或許不是歷史研究唯一的追求目標，因為對於一歷史事件的印象，即使與史實有所出入，亦往往可對其他時空的社會產生作用，從而影響另一段歷史。²¹⁶ 兩造對於此一事件的記載與說詞，常有意無意地浮現出自尊自大的主觀意識，從而引發逃避、掩飾甚或竄改的行為，也恰是在這種真相與印象的距離日益加大的過程當中，中、西方的大勢出現轉移。

依據情理判斷，當時不論馬戛爾尼行用何種禮節，乾隆皇帝似乎都不太可能對其要求（開放通商口岸，並劃地聽其使用）做出讓步，英國社會對清朝所提出的觀禮儀式則深感屈辱，加上一八一六年阿美士德使團又因不願向嘉慶皇帝三跪九叩而被驅逐出境，這種種怨氣讓中國的形象開始與「傲慢」、「奴性」、「野蠻」與「低能」等形容詞連在一塊。²¹⁷ 英國獅在與中國龍瞋目對望半個世紀之後，終在一八四〇年鴉片被禁時伸出怒爪，咬得中國龍遍體鱗傷！美國總統小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 1767-1848）甚至聲稱中、英第一次戰爭的真正原因，不是鴉片而是叩頭，²¹⁸ 其說或有些言過其實，但不可否認地，歷來的觀禮之爭應是造成衝突的導火線之一。

鴉片敗戰後的中國，不再有條件堅持三跪九叩的朝貢儀禮，但面對各國以西禮觀見並親遞國書的要求，清廷始終以各種藉口拖延。在同治帝親政的第二天，英、法、俄、美、德五國公使又聯名向總理衙門遞交照會，要求皇帝召見。雖然許多官員主張祖宗之制不可變，但也有人建議應有所因應，如北洋大臣李鴻章就認為朝廷禮制應「以時為變通」，以面對這「數千年一大變局」。同治十二年（1873），這場新的觀禮之爭終於有了結果，總理衙門與五國公使議定以後觀見時不行跪拜禮，且入覲禮節和言詞需「先期繪圖演習」；但為表達善意，公使們同意在頭一次觀見同治帝時，願將觀見本國君主的三鞠躬禮改成五鞠躬禮，以表示「格外誠敬」，惟其中日本公使仍堅持用三揖之禮。自此，中、西的外交觀禮之爭才在列強的壓力下出現新局，然而，此距馬戛爾尼使華已過了八十年！²¹⁹

²¹⁶ 類似想法亦可見於柯文對義和團事件之研究，參見 Paul A.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²¹⁷ 畢可思 (Robert A. Bickers) 著，張順洪譯，〈通商口岸與馬戛爾尼使團〉，收入張芝聯、成崇德主編，《中英通使二百週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314-331。

²¹⁸ 何偉亞，《懷柔遠人》，頁236。

²¹⁹ 此段參見王開壘，《隔膜、衝突與趨同》，頁291-314。

光緒元年（1875），英國譯員馬嘉理（Augustus Margary, 1846-1875）在雲南被殺，清廷不僅賠銀二十萬兩，還被迫派專使赴英道歉，郭嵩燾（1818-1891）即是在此一屈辱的情形下於一八七七年銜命抵達倫敦。做為晚清第一位赴英的使節，郭嵩燾在呈遞到任國書時，也必須面對觀禮的問題。事前，他曾為行禮方式向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等人探詢；依當時的國際慣例，各國公使在覲見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 1837-1901年在位）時，大多是行鞠躬禮；但一八七二年緬甸使節入覲時，則是雙膝跪地，雙手捧呈禮物。²²⁰ 由於英人遲遲未告以應遵循的外交禮儀，郭氏最後乃自行決定行鞠躬禮。²²¹ 郭嵩燾在出使時，並未帶著中、英兩國先前往來歷史的清晰回憶；然而，先前兩次英使來華時在觀禮方面所遭遇的「侮辱」，或仍令威妥瑪等人耿耿於懷，他們或一心想冷眼看清使的笑話。

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運動風起雲湧，遂引發八國聯軍侵華。醇親王載灃因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C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 1854-1900）在北京被殺，而奉派赴德道歉。在覲見德皇之前六天，載灃突然接到通知，聲稱德皇將端坐在椅上受其行三鞠躬禮，但隨同的參贊等人，則必須照中國臣子的覲君之禮三跪九叩，此舉恰同於阿美士德所曾提出的妥協方案；幾經交涉，德國方面最後才同意免除跪拜禮。雖然大清禮制中的跪拜儀式，應是此類衝突事件發酵的源頭，但清廷始終未能從根本脫出此一魔咒，此禮一直要到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之後才於一九一二年被明令廢除。²²²

八國聯軍在北京的掠奪，成為近代每個中國人共同背負的恥辱，也讓乾隆皇帝坐過的龍椅流落歐洲，並於一九二二年輾轉為倫敦的 Victoria and Albert 博物館收藏，旋即成為該館東方文物的展示焦點。此一展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始移入庫房。對馬戛爾尼在乾隆帝面前所遭受屈辱記憶的補償心理，想必是其吸引英國觀眾的重要原因之一。²²³

²²⁰ Lydia H. Liu（劉禾），*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p. 56.

²²¹ 范繼忠，〈孤獨前驅：郭嵩燾別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頁217-227。

²²² 此段參見王開璽，〈隔膜、衝突與趨同〉，頁385-392；〈試論中國跪拜禮儀的廢除〉，《史學集刊》2004.2：18-21。

²²³ Craig Clunas, "Oriental Antiquities/Far Eastern Art,"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2.2 (1994): 318-355; Liu, *The Clash of Empires*, pp. 213-218.

馬戛爾尼使華時，語言的溝通始終是一複雜問題：隨團的通事李自標，除其母語漢文之外，僅通拉丁文和義大利文；小斯當東在其德籍家庭教師伊登勒的嚴格要求下，習得一口漂亮的法語和拉丁語，他並從李自標學漢語；乾隆皇帝等清朝的統治階層，乃以滿文及漢文為官方語言；至於奉派協助通譯之在華葡萄牙籍或法國籍天主教傳教士，則均不諳英文。故歐洲知識階層通行的拉丁文，遂成為大家最有效的溝通媒介，且往往必須經過不止一次的傳譯過程。²²⁴

但曾幾何時，被乾隆朝軍機章京管世銘蔑稱為「野鹿腔」的英語，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卻發展成全世界最強勢的語言。相對地，拉丁文和滿文則幾乎從口語中消失。許多中國人長久以來擁有的高高在上的優越感，更有時被代以崇洋媚外或自卑自憐的心態，從而對民族尊嚴十分敏感。²²⁵ 原本西方人需要大費口舌加以解釋的叩頭禮，亦在馬戛爾尼和阿美士德兩使團之後，衍生出一個帶有嘲弄和荒唐可笑涵義的新字“kotow (or koo-too, kowtow, koutou)”。²²⁶ 今日我們從各英文字典所收入的這顆「活化石」之上，仍可見到近代中、西兩大文明衝撞後所留下的深長裂痕和斑斑血跡！

（本文於民國九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通過刊登）

²²⁴ 此段參見 Proudfoot, *Biographical Memoir of James Dinwiddie*, pp. 45-46; Peyrefitte, *The Immobile Empire*, pp. 7, 132-134, 574.

²²⁵ 二〇〇五年六月，在西安等地出現一則中國人跪求麥當勞延長價格優惠期限的廣告，經輿論的強烈抨擊，該廣告旋遭停播。此一反應或與近代中國在列強侵略下所造成的眾多國恥有密切關聯，但亦與清廷要求英使行跪叩禮一事，呈現明顯對比。參見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5-06/23/content_3123545.htm.

²²⁶ Barrow, *Travels in China*, p. 213; Robert Morrison, *A Memoir of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 during an Embassy from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the Court of China in the Year 1816* (London, 1819), p. 3; Ellis,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ate Embassy to China*, 1:213-214; Henry Yule, *Hobson-Jobson: A Glossary of Colloquial Anglo-Indian Words and Phrases, and of Kindred Terms, Etymological,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Discursive* (London: J. Murray, 1903), pp. 492-494; James L. Hevia, "The Scandal of Inequality: Koutou as Signifier,"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3.1 (1995): 97-118.

後記

此研究受國科會計畫「龍與獅對望的世界：英使馬戛爾尼來華事件個案研究」(NSC 94-2411-H-007-001) 以及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講座之支持，筆者亦感謝愛爾蘭皇家學院 Linde Lunney 博士、大英圖書館 Frances Wood 女士、臺北中央研究院陳國棟教授及陳正國教授、北京清華大學葛兆光教授、北京中國科學院韓琦博士、上海復旦大學董少新博士、澳大利亞雪梨大學曾敬民博士、新竹清華大學游博清及常修銘同學、北京大學陳昱良同學的熱情協助或指正。本文所引的部分西方原始著述，即使已有中譯本，但為求忠於原作，筆者均儘量重新斟酌其文意。

2005年9月，我與長女書梅費了好些功夫，才找到倫敦泰晤士河邊的 Saint Nicholas' Parish Church，當在墓園數百個碑中辨認出馬戛爾尼的墳時，內心激動莫名。對教堂的執事而言，馬戛爾尼還算不上赫赫有名，其墳侷促在墓園一角，碑上的文字大多已漫漶不堪。筆者在其墳前肅容對這位名留中國近代史的英國人，行了雙膝下跪禮，希望能多少平復他在覬見乾隆皇帝時內心的怨懣。但衷心冀盼所有這些有條件影響歷史的政治人物，常能反求諸己，將心比心，力求以德感人，以理服人，以情動人。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朝鮮正宗大王實錄》，漢城：探求堂，198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承德市文物局編，《清宮熱河檔案》，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據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序刊本景印，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1993。

安德遜（Aeneas Anderson）著，費振東譯，《英國人眼中的大清王朝》，北京：群言出版社，2002。

托津等纂，《欽定大清會典圖（嘉慶朝）》，據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刊本景印，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李東陽等纂，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據明萬曆十五年（1587）刊本景印，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

阿桂，《八旬萬壽盛典》，據《文淵閣四庫全書》鈔本景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孫玉庭，《寄圃老人自記年譜》，據清道光間刊本景印，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徐朝俊，《高厚蒙求》，清嘉慶間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特登額等纂，《欽定禮部則例》，據清道光間刊本景印，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文獻叢編》，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64。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梁廷柟，《英吉利國記》，據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序刊本景印，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8。

- 斯當東 (George Leonard Staunton) 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香港：三聯書店，1994。
- 跛臣 (Alexander Pearson) 著，斯當東 (George Thomas Staunton) 譯，《英吉利國新出種痘奇書》(*The Extraordinary History of a New Method of Inoculating Discovered in the Kingdom of England*)，清嘉慶十年 (1805) 刊本，英國皇家學會藏。
- 管世銘，《韞山堂詩集》，清光緒二十年 (1894) 重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趙爾巽等，《清史稿》，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6。
-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 德保，《欽定禮部則例》，據清乾隆四十九年 (1784) 刊本景印，收入《清代各部院則例》，香港：蝠池書院出版公司，2004。
- Abbott, Jacob. *China and the English: or the Character and Manners of the Chinese*. New York: Leavitt, Lord, & Co., 1835.
- Abel, Clarke. *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and of a Voyage to and from That Country, in the Years of 1816 and 1817*. London: Longman, etc., 1818.
- Adams, W. *The Modern Voyager and Traveller through Europe, Asia, Africa, & America*. London: Henry Fisher, Son, & P. Jackson, 1828.
- Anderson, Aeneas (安德遜). *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Years 1792, 1793, and 1794*. London: J. Debrett, 1795.
- Anonymous. "Sketch of the Reign of Tchien-Lung, Late Emperor of China; Including the Reception of Earl Macartney." *The Britannic Magazine* 12, no. 181 (1807): 408-422.
- . *A Complete View of the Chinese Empire . . . a Dissertation on Its Antiquity, and a Genuine and Copious Account of Earl Macartney's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London: J. S. Pratt, 1842.
- . *A Delicate Inquiry into the Embassies to China, and a Legitimate Conclusion from the Premises*. London: Thomas and George Underwood & J. M. Richardson, 1818.
- . *An Asylum for Fugitive Pieces, in Prose and Verse*. London: J. Debrett, 1793.
- . *An Accurate Account of Lord Macartney's Embassy to China*. London: Vernor & Hood.

- . *Scenes in China, Exhibiting the Manners, Customs, Diversions, and Singular Peculiarities of the Chinese . . . Including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iculars in Lord Amherst's Recent Embassy*. New York: Samuel Wood, 1819.
- Barrow, John. *Travels in China*. London: T. Cadell & W. Davies, 1806.
- Corner, Julia. *China: Pictorial, Descriptive and Historical with Some Account of Ava and the Burmese, Siam and Anam*. London: Henry G. Bohn, 1853.
- Davis, John Francis. *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36.
- Dennison, James. *The Journal of a Voyage to China in H.M.S. Alceste . . .* 1816-1817. A copy in the Rare Book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Division, McGill University Libraries, Quebec.
- Ellis, Henry.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ate Embassy to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1818.
- Hall, Basil. *Voyage to Loo-Choo and Other Places in the Eastern Seas, in the Year 1816*. Edinburgh: Archibald Constable & Co., 1826.
- Holmes, Samuel. *The Journal of Mr. Samuel Holmes*. London: W. Bulmer & Co., 1798.
- Hüttner, Johann Christian. *Nachricht von der Britischen Gesandtschaftsreise durch China und einen Teil der Tartarei*. Sigmaringen: Jan Thorbecke Verlag, 1996. First published 1797 by Vossische Buchhandlung.
- Morrison, Robert. *A Memoir of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 during an Embassy from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the Court of China in the Year 1816*. London, 1819.
- Proudfoot, William Jardine. *Biographical Memoir of James Dinwiddie, LL.D., Astronomer in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1792, '3, '4*. Liverpool: Edward Howell, 1868.
- Sears, Robert, ed.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a and India*. New York: Robert Sears, 1855.
- Staunton, George Leonard.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London: W. Bulmer and Co., 1797.
- .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Philadelphia: Robert Campbell, 1799.

黃一農

- Staunton, George Thomas. *Corrected Report of the Speech of Sir George Staunton, on Sir James Graham's Motion on the China Trade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April 7, 1840*. London: Simpkin, Marshall, & Co., 1840.
- . *Journal of a Voyage to China*, 2nd part. Special Collections Library, Duke University, 1793-1794.
- . *Memoir of the Life and Family of Sir G. L. Staunton*. Havant: private circulation, 1823.
- . *Memoirs of the Chief Incidents of the Public Life of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Bart.* London: private circulation, 1856.
- . *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g in 1816*. London: private circulation, 1824.
- van Braam, André Everard.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Embassy of the Dutch East-India Company, to the Court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in the Years 1794 and 1795*. London: R. Phillips, 1798.
- Winder, Edward. *Account of a Voyage to Brazil, Tristan da Cunha and the East Indies*. 1793. A copy in the MSS Division, National Library, Dublin.

二、近人論著

方豪

- 1969 《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牛軍凱

- 2005 〈三跪九叩與五拜三叩：清朝與安南的禮儀之爭〉，《南洋問題研究》2005.2：46-52。

王曾才

- 1978 〈馬戛爾尼使團評述〉，收入《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235-248。

王開璽

- 1999 《隔膜、衝突與趨同：清代外交禮儀之爭透析》，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2004 〈試論中國跪拜禮儀的廢除〉，《史學集刊》2004.2：18-21。

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著，溫洽湓譯

- 2001 《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朱雍

- 1989 《不願打開的中國大門：18世紀的外交與中國命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艾爾曼 (Benjamin Elman)、胡志德 (Theodore Hutters)

- 1997 〈馬嘎爾尼使團、後現代主義與近代中國史：評周錫瑞對何偉亞著作的批評〉，《二十一世紀》44：118-130。

何偉亞 (James L. Hevia) 著，鄧常春譯

- 2002 《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李云泉

- 2004 《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係體制研究》，北京：新華出版社。

佩雷菲特 (Alain Peyrefitte) 著，王國卿等譯

- 1993 《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北京：三聯書店。

周遠廉編

- 2003 《清朝通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紀欣

- 2004 〈清代軍機章京述論〉，《承德民族師專學報》2004.4：56-58。

范繼忠

- 2002 《孤獨前驅：郭嵩燾別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孫文良、張杰、鄭川水

- 2005 《乾隆帝》，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徐中約 (Immanuel C. Y. Hsü) 著，計秋楓、朱慶葆譯

- 2001 《中國近代史》(*The Rise of Modern China*)，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秦國經、高煥婷

- 1998 《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秦國經

- 1996 〈從清宮檔案看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歷史事實〉，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頁23-88。

張芝聯、成崇德主編

- 1996 《中英通使二百週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張隆溪

- 2001 〈「餘論」的餘論〉，《二十一世紀》65：90-91。

黃一農

畢可思 (Robert A. Bickers) 著，張順洪譯

- 1996 〈通商口岸與馬戛爾尼使團〉，收入張芝聯、成崇德主編，《中英通使二百週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314-331。

陳國棟

- 1997 〈1780-1800，中西貿易的關鍵時代〉，收入張炎憲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六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頁249-280。

游博清

- 2004 《小斯當東：19世紀的英國茶商、使者與中國通》，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一農

- 2003 〈龍與獅對望的世界：以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後的出版物為例〉，《故宮學術季刊》21.2：265-297。
- 2005 《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葛劍雄

- 1998 〈就事論事與不就事論事：我看《懷柔遠人》之爭〉，《二十一世紀》46：135-139。

劉家駒

- 1989 〈英使馬戛爾尼謁見乾隆皇帝的禮儀問題〉，收入《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27-49。

聶崇正

- 1992 《清代宮廷繪畫》，北京：文物出版社。

戴廷杰 (Pierre-Henri Durand) 著，許明龍譯

- 1996 〈兼聽則明：馬戛爾尼使華再探〉，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頁89-150。

蘇精

- 2005 《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Beeching, Jack

- 1975 *The Chinese Opium Wars*. San Diego: Harvest/HBJ Book.

Bickers, Robert A. (畢可思)

- 1993 *Ritual & Diplomacy: The Macartney Mission to China 1792-1794*. London: The Wellsweep Press.

- Boxer, C. R.
1939 "Isaac Titsingh's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Ch'ien Lung (1794-1795)." *T'ien Hsia* 8.1: 9-33.
- Cameron, Nigel
1970 *Barbarians and Mandarins: Thirteen Centuries of Western Travelers in China*. New York: John Weatherhill, Inc.
- Chen, Jeng-Guo S. (陳正國)
2004 "The British View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Class Consciousness."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45.2: 193-205.
- Ch'en, Kuo-Tung Anthony (陳國棟)
1990 *The Insolvency of the Chinese Hong Merchants, 1760-1843*. Taipei: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 Clunas, Craig
1994 "Oriental Antiquities/Far Eastern Art."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2.2: 318-355.
- Cohen, Paul A. (柯文)
1997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ranmer-Byng, J. L., ed.
1962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2004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London: The Folio Society.
- Duyvendak, J. J. L.
1938 "The Last Dutch Embassy to the Chinese Court (1794-1795)." *T'oung Pao* 34.4: 1-137.
- Esherick, Joseph W. (周錫瑞)
1998 "Tradutore, Traditore: A Reply to James Hevia." *Modern China* 24.3: 328-332.
- Farrington, Anthony
2002 *Trading Places: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Asia 1600-1834*.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Fatica, Michele

- 1996 "Gli Alunni del Collegium Sinicum di Napoli, La Missione Macartney Presso L'Imperatore Qianlong e la Richiesta di Libertà di Culto per i Cristiani Cinesi (1792-1793)," in *Studi in onore di Lionello Lanciotti*. Edited by S. M. Carletti, M. Sacchetti, P. Santangelo.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2:525-566.

Foust, Clifford M.

- 1969 *Muscovite and Mandarin: Russia's Trade with China and Its Setting, 1727-1805*.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Hevia, James L. (何偉亞)

- 1995a "The Scandal of Inequality: Koutou as Signifier."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3.1: 97-118.
- 1995b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1998 "Postpolemical Historiography: A Response to Joseph W. Esherick." *Modern China* 24.3: 319-327.

Hibbert, Christopher

- 1971 *The Dragon Wakes: China and the West 1793-1911*. Newton Abbot, UK: Readers Union.

Jackson, Anna & Amin Jaffer, eds.

- 2004 *Encounters: The Meeting of Asia and Europe, 1500-1800*. London: V & A Publications.

Jacobson, Dawn

- 1993 *Chinoiserie*. London: Phaidon Press Ltd.

Jarrige, Jean-Fraçois, et al.

- 1994 *Visiteurs de l'Empire céleste*. Paris: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Legoux, Susan

- 1979 "Lord Macartney's Audience with the Emperor of China." *Connoisseur* 200, no. 804: 122-127.

Liu, Lydia H. (劉禾)

- 2004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orse, Hosea Ballou

- 1926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eyrefitte, Alain (佩雷菲特)

- 1989 *L'Empire immobile ou le choc des mondes*.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Translated by Jon Rothschild as *The Immobile Empire: The First Great Collision of the East and Wes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92).
- 1990 *Images de l'Empire immobile*.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 1991 *Un choc de cultures: La vision des Chinois*.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 1998 *Un choc de cultures: Le regard des Anglais*.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 2000 *Un choc de cultures: L'oeil des Missionnaires*.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Pritchard, Earl H. (普理查德)

- 1934 "Letters from Missionaries at Peking Relating to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ung Pao* 31: 1-57.
- 1943 "The Kotow in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in 1793."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2.2: 163-203.

Rockhill, William Woodville

- 1897 "Diplomatic Missions to the Court of China: The Kotow Question II."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4: 627-643.

Singer, Aubrey

- 1992 *The Lion and the Dragon: The Story of the First British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the Emperor Qianlong in Peking 1792-1794*. London: Barrie & Jenkins Ltd.

Spivey, Lydia Luella

- 1968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Agent for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in China 1798-1817." Master's thesis, Duke University.

Tillotson, G. H. R.

- 1987 *Fan Kwae Pictures: Paintings and Drawings by George Chinnery and Other Artist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ondon: Spink & Son Ltd.

Townsend, W. J.

- 1928 *Robert Morrison: Pioneer of Missions to China*. London: Pickering & Inglis.

黃一農

Wild, Antony

- 1999 *The East Indian Company: Trade and Conquest from 1600*. London: HarperCollins.

Wood, Frances

- 1998 "Closely Observed China: From William Alexander's Sketches to His Published Work." *British Library Journal* 24.1: 98-121.

Yule, Henry

- 1903 *Hobson-Jobson: A Glossary of Colloquial Anglo-Indian Words and Phrases, and of Kindred Terms, Etymological,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Discursive*. London: J. Murray.

Zeng, Jingmin (曾敬民)

- 1998 "Scientific Aspects of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1792-1794: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ish and Chinese Conceptio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Zhang, Shunhong (張順洪)

- 1990 "British Views on China during the Time of the Embassies of Lord Macartney and Lord Amherst (1790-1820)." PhD diss., University of London.

Impression vs. Reality:
A Study on the Guest Ritual
Controversy between Qing China and Britain

Yi-Long Hu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mong all incidents that took place during the visit of 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 and his retinue to China in 1793, the diplomatic encounter involving the guest ritual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is particularly controversial. Which form of ceremony Macartney actually performed in front of Qianlong's throne has long been an unsolved mystery and topic of debate in academic circles.

Using numerous documents from the Qing imperial archives, British manuscripts, as well as printed materials from various libraries throughout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the author attempts to provide an objective and comprehensive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se guest rituals and how they were narrated throughout history.

By analyzing the way in which texts and illustrations were produced, and conducting direct and cross examinations, the author attempts to grasp the subjective point of view of each author. New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Chinese and the British reached a compromise, and later reports of these guest rituals documented by Chinese and British officials were created in such a way as to provide ample room for interpretation advantageous to each side, while neglecting those aspects considered less respectful.

The agreement was that Macartney would perform a slightly modified Chinese ceremony during the reception of the British Ambassador, which consisted of kneeling three times on both knees and bowing profoundly thrice each time without performing the kowtow. Immediately thereafter he would perform the British ceremony when delivering the credential, which involved kneeling on one knee and delivering the document into the Emperor's own hands while omitting the kissing of the Emperor's hand.

黄一農

Macartney later denied having knelt down on both knees and this controvers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fluenced the diplomatic encounte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Britain when Macartney's successors William Pitt Amherst (1773-1857) and William John Napier (1786-1834) visited China in 1816 and 1833, respectively. Analyzing these events, the author tries not only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se confrontations on the Opium War and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late-Qing, but also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impression and reality in history.

Keywords: Sino-Britain relations, guest ritual controversy, George Macartney, William Pitt Amherst, George Leonard Staunton